●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主编　任继愈●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黄石林　朱乃诚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主编　任继愈●



ZHONG GUO WEN HUA SHI ZHI SHI CONG SHU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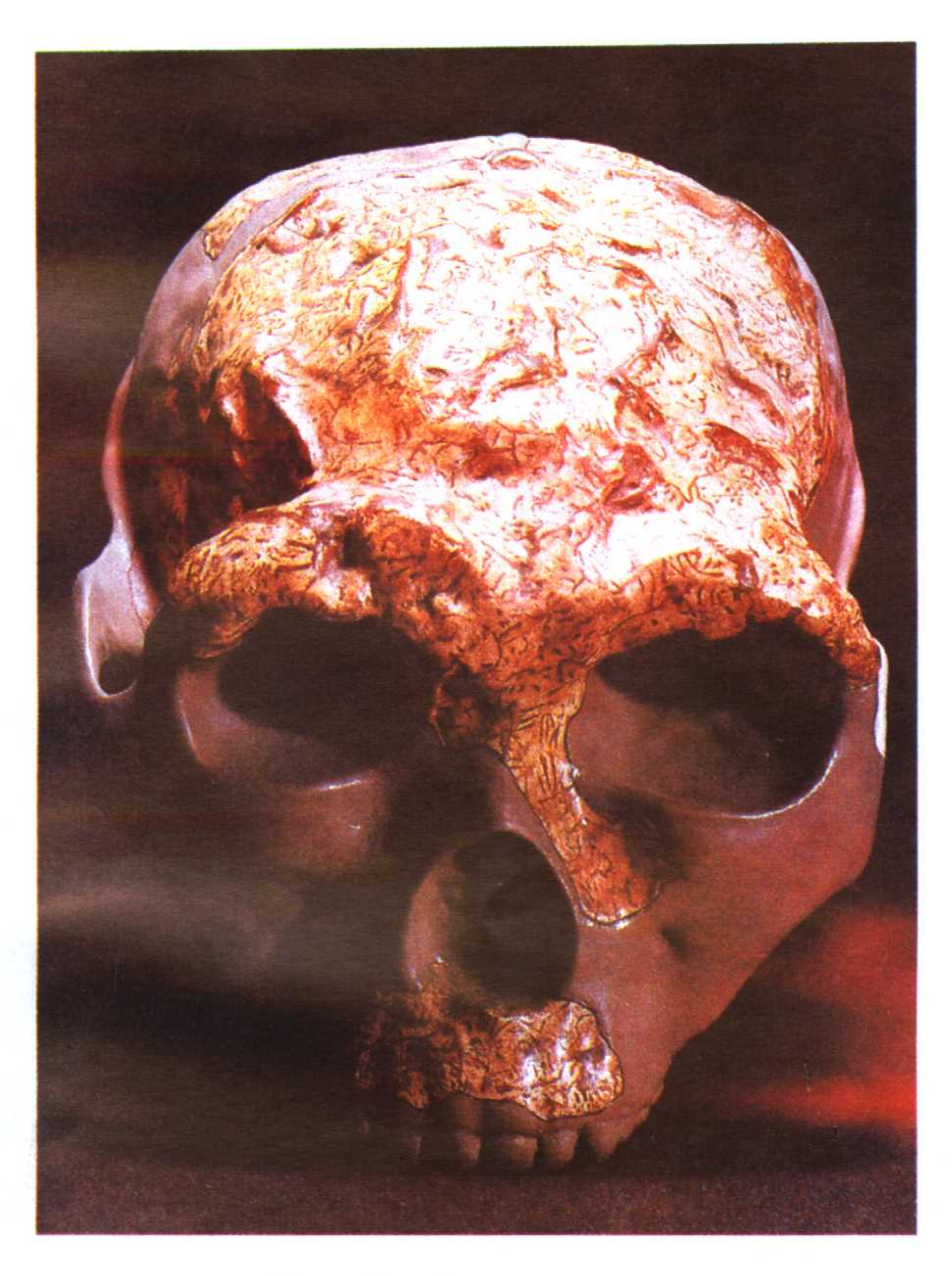
黄石林　朱乃诚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京)新登字 100 号

责任编辑　冯世平
封面设计　王　岐
版式设计　冯　力
责任校对　胡林妮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黄石林　朱乃诚
*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960 毫米　32 开　4.75 印张　62 千字
1991 年 11 月第 1 版　　199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ISBN7-5035-0511-7/G・27
定价：2.50 元



兰 田 人 头 骨

红山文化玉猪龙



仰韶文化「殿堂式」房址▽





△良诸文化祭坛墓地



河姆渡文化骨铲



龙山文化彩绘蟠龙纹陶盘



二里头文化铜爵



商代夔鋬象牙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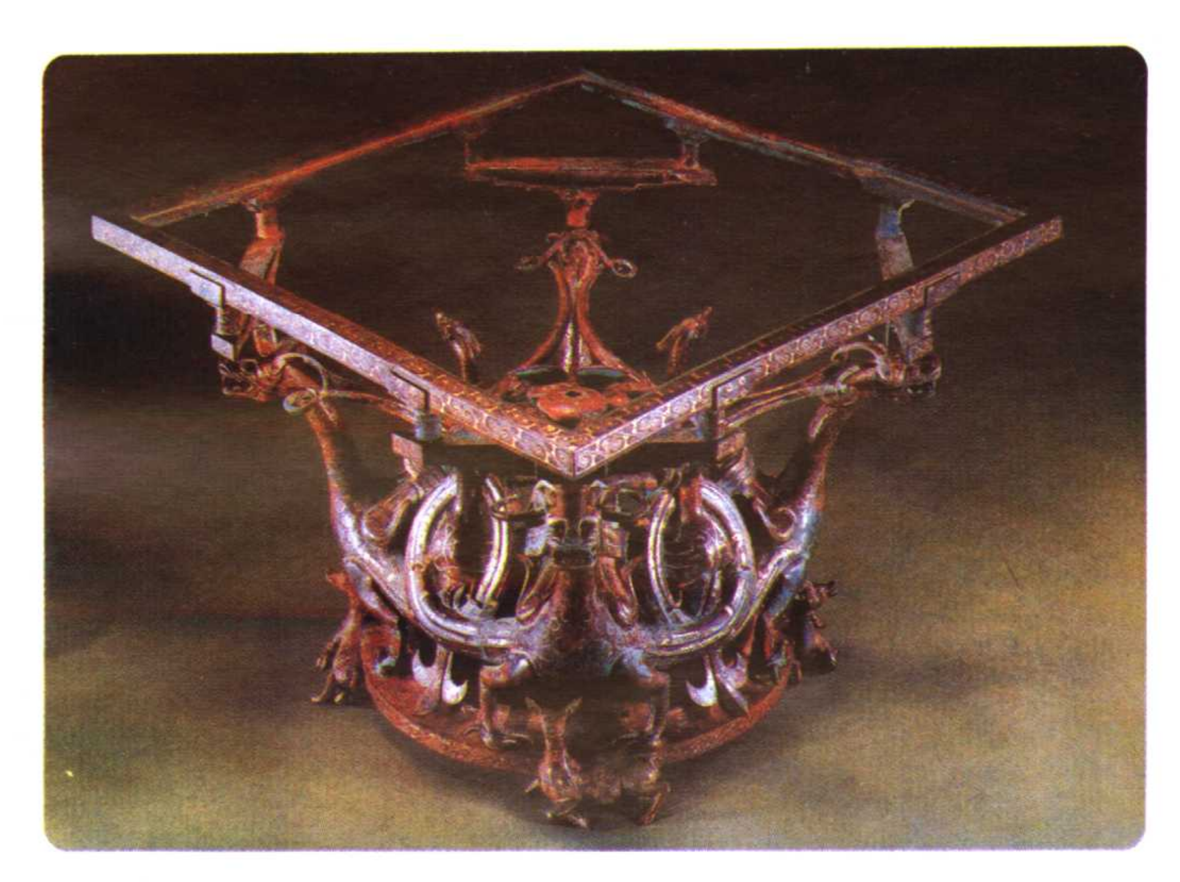
商代铜鸮尊



商代青铜
人立像

东周青铜
编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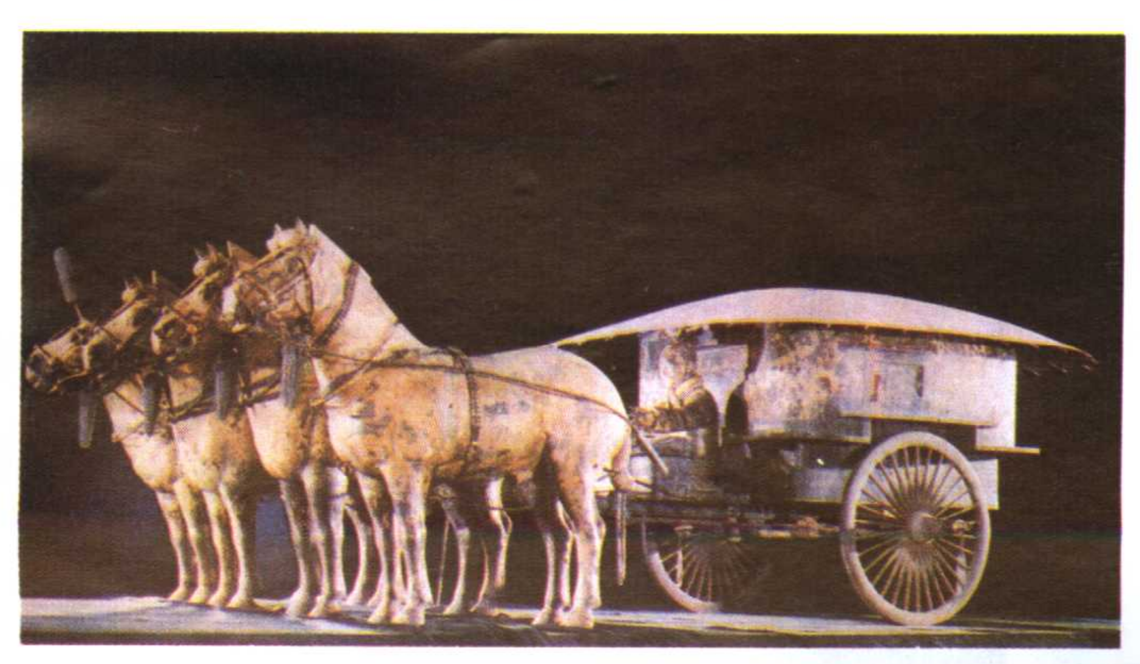




战国错金银青铜龙凤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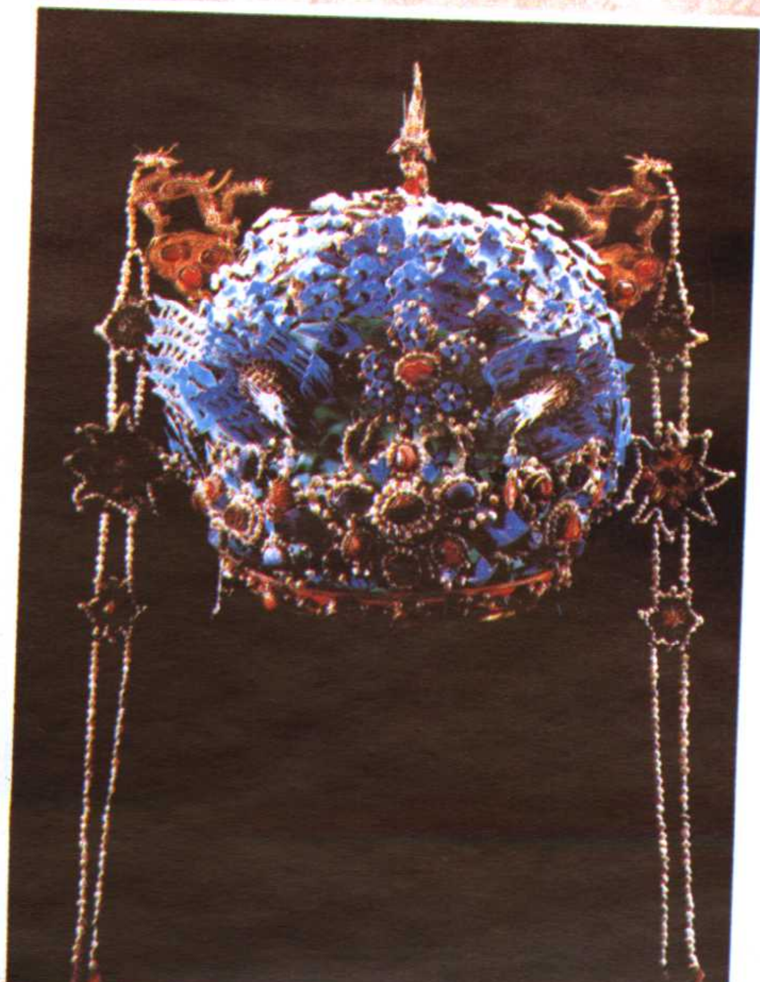


秦 铜 车 马





唐代仕女图



明代金累丝点翠凤冠

编 者 献 辞

我们伟大的祖国在几千年漫长的发展中，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它曾长期居于世界文明的前列，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了贡献，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巨大财富。世界上的文明古国都曾对人类文化做过贡献，但是随着历史的前进，它们多衰落了。只有中国和中国文化屹立于世界之林，一脉相承，历久而弥新！

中国文化是个发展的、历史的范畴，具有包容性与持续性：首先，除了时代差异外，尚有着地域与民族的差异性。它是在连绵几千年中，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各地域文化（包括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闽台文化等）和各民族文化（包括壮、满、蒙、回、藏等中国56个民族的文化）长期

的、不断的交流、渗透、竞争和融合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具体的、历史的、多地域、多民族、多层次的立体网络；其次，中国文化是起源于上古贯穿至现在，在黄河、长江及其周围地域形成并延续至今的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共同的社会心理与习俗的结晶。

继承中国文化遗产，并不是对古代文化毫无选择地一概接受，而是要继承其优良传统，摈弃其封建糟粕。

我们要继承、发扬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基本精神是指刚健自强的革新进取精神，注重道德教化，强调民族凝聚意识，以及重视历史智慧等几个主要方面。

今天，中国正处在向现代化迈进的新时期。了解过去的优秀文化，正是为了创造未来的新文化。这对提高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的凝聚力，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广泛地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既是当务之急，又是长远大计。要让中学生及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掌握中国文化史的基本知识，即了解中国文化的辉煌历史与它的优良传统，从

而给爱国主义打下稳固的思想基础，为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创造条件。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业，也是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初衷。

我们设计了历史、考古、地理、思想、文化、教育、科技、典章制度、军事、经济、文艺、体育、生活习俗等方面的110个专题，希望这一套丛书从多角度、多层次、系统地反映中国文化的主流与特点。如果海内外读者能从中认识中国文化的基本面貌，这就是编者的最大满足了。

对于本书的批评与建议，我们将十分欢迎。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编委会

1991年2月22日　北京

目　录

引　言

中国作为世界上文明发达较早的国家之一，很早就有学者注意到古代遗迹的考察和古代遗物的研究。但是，以科学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在我国却出现较迟，从本世纪20年代发现北京猿人化石、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进行安阳殷墟等项大规模发掘，到现在仅有六七十年的历史。

1949年以后，中国考古学得到迅速的发展。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蓬勃开展，调查发掘遍及全国各地，重要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中国考古学上的年代缺环和地域空白被逐渐地填补，使我们对祖国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有了更加全面的具体认识。

史前时期的考古发现，极大地改善了对我国远古历史的研究。中国是世界上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和猿人化石埋藏丰富的国家。由于元谋猿人及其文化的发现，使祖国历史的开端比过去所知北京猿人提早了

100 多万年。新石器时代方面，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和长城地带，都已建立当地原始文化的编年体系，并且发现距今七八千年的较早遗存。从而认识到我国各地的新石器文化并不来源于中原地区一个中心，而是存在若干个中心，呈现多元一统的发展格局。若干原始聚落遗址和氏族公共墓地的大面积揭露，有助于深入了解不同类型原始文化的社会经济状况。一些地方接连发现反映较高文化发展水平的祭坛、大墓等遗迹，则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

与中国国家起源密切相关的夏文化问题，虽然仍未取得学术界公认的共同结论，但所作的探索已有显著的进展。商代和西周时期的重要发现：偃师、郑州两地的商代早期城址，安阳殷墟的妇好墓和其他墓葬，新干商代贵族墓和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周原、丰镐的西周宫室建筑基址和青铜器窖藏，以及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等项，进一步反映商周青铜文化的面貌和奴隶制社会的特点。东周列国都城遗址的勘察，随州曾侯墓、平山中山王墓等大型墓的发掘，充分显

示了当时各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的考古发现，特别是有计划地勘察历代都城的布局情况，探讨我国古代都城建制的演变规律；陆续发掘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墓葬，考查丧葬礼俗的变化，进行各类出土文物的综合研究，为研究各个时期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提供生动的实物资料。大量的考古新资料，又为探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方面的伟大成就，研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古代文化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提供了确切的实物证据。

总之，中国的重大考古发现丰富多彩、美不胜收，本书因篇幅所限，无法进行详细的全面阐述，现选择部分历史意义重大的发现作简单的概括介绍。

一　史前时期

1 北京猿人及年代更早的遗迹

人是由古猿类进化演变而来的。这个现在看来十分简单的道理，长期以来不为人们接受，直到1929年发现了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之后，才得到世人的公认。

北京猿人洞(即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位于北京市西南郊房山县周口店镇龙骨山北坡，1921年发现。在1921、1923及1927年的发掘中，发现了三枚人牙，经研究将他们定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或“北京中国猿人”。震惊中外的北京人第一个头盖骨则是在1929年12月2日下午发现的，后来还发现了人工制作的石器和用火遗迹。1937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发掘工作被迫中断，而已发现的这批为世人瞩目的珍贵化石，于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全部在几个美国人手里弄得下落不明。新中国成立后，恢

复了发掘工作，并在各次发掘中获取大量化石资料。至1966年共发现了大约代表40多个个体的北京人化石和10多万件的石器，以及丰富的骨器、角器、用火遗迹等。北京猿人洞是世界上发现的材料最丰富也是最系统的旧石器时代早期阶段的人类遗址。

北京猿人洞的文化堆积厚达40多米，大致形成于距今70万年到23万年间，北京猿人则大约在距今46万年前开始居住于此。北京猿人的个子矮于现代人，男子身高约162厘米，女子身高约152厘米。北京猿人的头盖骨低平，眉脊骨粗大，脑壳比现代人厚一倍，脑量平均为1088毫升，约等于现代人脑量的80%；面部较短，宽鼻子，吻部前伸，没有下颏。整个头部的特征较为原始，与发现于印尼的爪哇直立人接近，但已具有明显的现代蒙古人种的特征。

北京猿人的食物来源主要依靠狩猎与采集所得。制做的工具主要是石器，可能还有骨角器，其中小型的石质“尖状器”制作精致，尚不见于世界上其他同时期的遗址中。北京猿人已知熟食，其用火主要取于自

然火种，能够保存火种。火的使用完备了人的特征。

北京猿人的发现，为我国古人类及其文化的研究奠定了基础，而新中国的建立，则为这一学科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40多年来，全国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文化已有170多处，遍布除海南与新疆之外的各个省区。其中人头骨保存完好的陕西大荔人、辽宁金牛山人以及山西丁村人、许家窑人、安徽银山人、湖北长阳人、广东马坝人、贵州桐梓人等化石，其年代约距今20多万年前至10多万年前，属早期智人，是研究直立人向智人（现代人亦属智人）发展的重要材料；而北京山顶洞人、广西柳江人、四川资阳人、贵州穿洞人等化石，其年代约距今10万年至1万年前，属晚期智人，他们对研究人种起源特别是蒙古人种的起源，具有重要的意义。此外，举世瞩目的蓝田人、元谋人和西侯度文化的发现，又将我国直立人和旧石器文化的年代提前至距今100多万年至180万年。

蓝田人头骨化石，于1964年在陕西蓝田县王公岭发掘出土，属于一个30多岁的

女性。其头骨特征较北京猿人原始，如额麟比北京猿人更为低平，眉脊硕大粗壮，脑量约为780毫升，牙齿比北京猿人更大些，等等。最近测出，埋藏该头骨化石地点的地磁年代，为距今110至115万年。蓝田人的石器主要有砍斫器、刮削器、三棱大尖状器等，都比较粗糙，其中三棱大尖状器，断面呈三角，制做得很有特色。

1965年5月，在云南省元谋县元谋盆地边缘的上那蚌村附近河湖相沉积中发现的两枚牙齿，是我国发现年代最老的直立人化石。这两枚牙齿都为上内侧门齿，一左一右，属同一成年人个体。牙齿很粗壮，基本形态与北京猿人接近，但具有明显的原始性。多数学者认为，埋藏这两枚牙齿的地层，其地磁年代为距今170万年前后。已发现的元谋人石器只有7件，但早在1961、1962年，在山西省芮城县西侯度村附近，发现了32件石器以及带切痕的鹿角和烧角，地磁测定的该地层年代为距今180万年，早于元谋人的年代。这说明早在距今170万年前后，在我国的南方与北方，都已有人类活动了。

2 距今七八千年的农业文化

中国是世界上古老的农业国之一。早在距今6000多年前，分布在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即拥有成熟的农作物种植业和家畜饲养业，以及灿烂的彩陶艺术。仰韶文化的生产技术成就表明，在她之前尚有一个农业经济的肇始阶段。然而，那时人们生产生活的情景一直鲜为人知。我国的农业始于何时，长期以来得不到肯定的答案。

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河南省零星发现了琢磨精致的石镰和石磨盘，其中石镰的形状与现今的铁镰刀相似，呈弯月形、锯齿刃。发现者以为它是年代较晚的收割工具，将它束之高阁。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测定了埋藏这种石镰的地层年代，使整个学术界大为震动，它是距今8000年前后的遗物。从此，中原地区云集了几路考古发掘队，遍寻这种石镰遗存，揭启了中华早期农业文化研究的序幕。

十多年来，在中原及其邻近地区发现的早期农业文化遗址已有近百处。对这些遗址的文化命名及其划分，目前尚未形成

统一的认识。大多数学者将它们区分为四个地区，以分布在嵩山为中心的豫中及豫北地区的称为裴李岗文化，分布在冀南、冀中地区的称为磁山文化，分布在关中渭水流域的称为白家文化（亦称大地湾文化或老官台文化），分布在汉中地区的称为李家村文化。

这时期居民的生活状况比仰韶文化要低下，过的是小型永久或半永久的定居聚落生活。居址规模较小，一般设在近河的丘岗上。居住的房屋主要是小型的半地穴式建筑，面积不足 10 平方米，也有多次扩建成三四间一组的排房，有台级式门道供出入，室内设烧灶，供煮食取暖，人们就地而卧，就地而食。发现的墓葬通常是成片成群，流行单人葬，也有合葬墓，大都以生产工具或生活用品随葬，如石工具、陶器等，有的墓设有壁龛（kān 刊），专供放置随葬品。当时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石器制造尚处于磨制技术的初期阶段，打制石器及细石片制成的复合工具仍在使用，铲、斧、镰、磨盘是主要的石工具；也有兽骨、蚌壳等质料制做的工具，如骨锥、骨针、骨箭头、

蚌镰、蚌刀等。陶器已在生活中广为使用，制陶业已脱离了人类最初制陶阶段，采用手制，器表打磨光滑，器型基本依用途定型，有壶、罐、碗、勺、杯、盘、盆等，已萌发了原始的彩绘艺术。捏塑的陶猪头、羊头，栩栩如生，是当时的艺术杰作，发现的陶纺轮是当时居民已经掌握原始纺线织物技术的最早实证。值得重视的是，1987 年在河南舞阳贾湖墓葬中出土的七孔骨笛，已经具备音阶结构，是世界音乐考古的重大发现；墓中出土的距今 8000 年的甲骨契刻符号，是探索汉字起源的重要线索。

当时的社会经济除沿袭以往的采集与渔猎外，已有种植业并饲养了家畜。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是黍（大黄米）和粟（小米）。这种农作物的炭化品，在当时的聚落址内时常发现。1976、1978 年，在河北武安磁山村东南部还发现了数十座地窖式粮仓。这些粮仓平面呈长方形，长约 1 米余，宽不足 1 米，深 2 至 5 米不等。粮仓内堆积着已炭化的粟粒，口部以厚厚的黄土封堵，可以推算当时未经炭化的粟粒可能载满粮仓。这是现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储存小米的粮仓。

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发现的整猪埋坑现象，既体现了当时的原始宗教意识，又表明了当时猪的饲养已有一定的数量。发现的家鸡遗骸则是目前世界上年代最早的发现。

随着中原地区早期农业文化研究的突破，在长江流域、北方的辽河流域以及华南地区，也先后发现了距今7000年前的农业文化遗存。其中，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的发掘，获取了距今8000年前后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的资料。

彭头山遗址地处洞庭湖西北部的澧水冲积平原上，为低岗遗址。1988年发掘了400平方米，发现有平地起建的房屋基址和18座墓葬。出土的石工具多见打制石器和细小石器，磨制石器较少，主要有穿孔坠饰、石管、小型斧等。陶器都为泥片贴塑制成，形状原始，有罐、釜(fǔ斧)、盆、钵(bō播)等。在陶器上以及制作陶器的泥料中，发现较多已炭化的植物颗粒，初步观察，可能是稻壳、稻谷。经对出土物的分析和年代测定，彭头山遗址的年代，早至距今8000年前，与中原地区的裴李岗文化接近。

农业的出现，人类才能最终摆脱采集渔猎的游荡生活，转入以定居为依托的改造自然界的农耕畜牧经济。近十多年来的发现与研究表明，大约在距今8000年前，我国的原始农人就活跃在黄河与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他们在黄河流域及其北方地区最先种植了黍和粟，在长江水系及其南方地区则最先栽培了稻。他们的辛勤劳动与创造发明，为人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3 半坡、姜寨等原始聚落遗址

我国的早期村落，由于年代久远，都已湮没于地下。1954至1957年，我国首次对西安半坡遗址的大规模发掘，为了解我国距今6000年前的村落，启开了一扇窗户。

西安东郊的半坡村落址，面积约3万平方米，已发掘了约1万平方米。村落由一条深5至6米、宽6至8米的大防卫沟环绕，房子和大部分的窖穴、家畜圈栏以及小孩瓮棺葬群，集中地分布在村落中心，并以一条小沟区分为两片，每片里有一座大房子和若干座小房子。大防卫沟以外的村北

是公共墓地，烧制陶器的窑场则在村子东头。

半坡村落址没有全部发掘，但它的发现为日后发掘完整的姜寨村落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姜寨村落址位于半坡村落址东北 15 公里，临潼县城北约 1 公里的临河东岸上，南依骊山北麓，遗址总面积约 5 万平方米。1972 至 1979 年，历经 8 年 11 次发掘，揭露 17000 多平方米，在遗址的最下层，发现了一个保存基本完好、距今约 6600 至 6400 年的原始村落址。这一村落址是经过前后多次增建、扩建，最后形成的村落址，分为居住区、公共墓地、窑场等三个部分。

居住区位于中部，呈椭圆形，面积约 26000 平方米。东、北、南三面挖设大壕沟环绕，作为对外的防御设施，西南部则以临河作为天然屏障。壕沟内侧，每隔一定距离设一小房子作为哨所，以瞭望村外情况。居住区的正门通道在西南部，那里紧靠临河。临河是当时居民日常生活的水源，制作陶器的作坊和烧制陶器的窑场也设在河旁。

居住区中央为一空旷的广场，面积约

5000平方米，是集体活动的公共场所。靠广场西边，设两处面积约50平方米的家畜圈栏。环广场四周，分五个方位建造房屋五组约100座。每组房屋约20座，以大型房屋为主体，周围环绕中、小型房屋，每座房屋的门都开向中央广场。大房屋平面呈方形，面积近百平方米，最大的一座达124平方米，室内设灶坑、灶台，置有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这种大房屋除作为居舍外，可能还是当时的议事中心。中型房屋平面亦呈方形，面积一般在20至40平方米，室内亦有灶坑及日常生产、生活用具。小房屋数量最多，平面有圆形、方形两种，面积约15平方米，同样设有灶坑、放置着生产、生活用具。中、小型房屋都是当时的居舍。储藏食物、用具的窖穴大都在房屋附近。

公共墓地位于大壕沟以东，由北而南发现了三片。墓地中埋的都是成年人，而婴儿大都装入大型陶器中埋于房舍附近。三片墓地共埋入170多人，这些人数与村落的规模是不相适应的，因此，可能另有其它几片墓地已遭破坏。

姜寨村落址的再现，为研究黄河流域、

距今6500年前后的村落形式、及其体现的社会组织结构，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研究者推测，村落中以大房屋为主体的一组房屋，其居民可能是当时社会最基层的生产、生活单位，而五个这样的社会基层单位组合成这个村落集体。姜寨村落址的总体布局，充分体现了当时按组管理、众心向一、共同劳作、平等分配的原始大农业的生活场面。这种村落形式，在距今6000年前后，可能散布于黄河流域。

南方地区的自然环境与黄河流域以及北方地区的不同，其村落的布局形式可能也不相同，但迄今尚未揭露出完整的原始村落址。1972年，河南淅川下王岗长屋的发现，为了解长江水系、距今约5500年前后的村落形式，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信息。

下王岗长屋为地面建筑，座落在淅川县城西南35公里的低岗上，东、南、北三面丹江环绕。长屋大体呈东北——西南向排列，宽约8米，长约84米，有房29间，另在长屋东端向南拐出3间。整个建筑分作20个单元。每个单元都设一个户外门道，室内布局可分为四种：第一种是一个门厅、一个

内间，第二种是一个门厅、三个内间，第三种是一个门厅、一个外间、一个内间，第四种是一个门厅、一个外间、二个内间。每个单元房的室内面积约15至39平方米不等，灶都设在内间。长屋的大门都面向东南，东端向南拐出的3间房屋的大门面向西南，门宽约56至125厘米，有的还设有门槛。屋墙以木柱架荆笆建成，壁面用草拌泥抹平。室内居住面垫上土，并铺设竹片编物。地面和墙都经火烧烤，比较坚硬。长屋前后有用红烧土铺成的硬面，作为活动场所。

下王岗长屋的平面结构，已具有相当先进的房屋设计原理，体现了一种较为进步的社会组织结构。研究者推测，这栋长屋的居民是当时的一个社会活动集体，可能就是一个大家族成员的居所；而各个单元则是一个独立的生活单位，可能就是大家族下各个家庭成员的居舍。

1983年，甘肃秦安大地湾发现一座属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殿堂式建筑，是迄今发现的距今5000年前规模最大的单个建筑址。该建筑址坐北朝南，有主室以及左、

右、后三室组成，前面设附属建筑和宽阔的场地。主室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 16 米，进深约 8 米，室内面积约 131 平方米，朝南设三个门，正门设在正中间，并设有内门道和外门篷，其左右两侧各开一旁门。值得引人注意的是，主室的地面是采用料礓石烧制的人造轻骨料与胶凝材料铺设的，经检测，其地面还相当于现今 100 号砂浆水泥地面的强度。整个建筑面积约 420 平方米，左右对称、主次分明，形成一个规模宏伟、结构复杂的建筑群体。它不仅体现了距今 5000 年前具有的令人惊叹的设计工艺成就，而且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组织机构已达到了空前发展的地步。

4 姜寨、王因和柳湾等原始氏族墓地

我国发现的原始氏族墓地已有数百处，其中规模最大的是 70 年代发掘的姜寨墓地、王因墓地和柳湾墓地。

1975 年，在陕西临潼县姜寨原始村落址的广场上，发现了埋葬 2000 多人的大型墓地，后来弄清楚这片墓地是在原村落废

弃后才开始形成的，其年代约在距今6000年前后，属仰韶文化半坡类型晚期。这一墓地占地面积约1000平方米，保存完整，发现墓葬180多座。墓葬都为长方形或方形土坑，大小不一，最大者长3.4米、宽2.4米，最小者长0.51米、宽0.37米。墓葬分布极为密集，在墓地中心部位，互相迭压的墓葬不胜计数。墓中的人骨，大都是暂埋若干时间后，再拾取主要骨骸重新安葬的"二次葬"。其中130多座墓是合葬墓，少则2人，多则达80多人，一般在20人左右，都是不分性别、不论辈份、男女老少合葬在一起。单人葬有50多座，其中单人一次葬有32座，葬式大都取仰卧伸直的姿式。随葬品一般是一墓一套，有的多人合葬墓则随葬两套以上，种类以陶器为主，也有石器、骨角器等，大都是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其中有座墓中还随葬着一套绘画工具，如带盖石砚、小研棒、水杯及赤铁矿颜料块等。180多座墓共埋葬了近2200人，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埋人数量最多的一处原始社会的墓地。

王因墓地位于山东兖州县王因村南

部，在1975年至1978年间的发掘中，发现墓葬899座，是黄河下游地区发现墓葬数量最多的一处史前墓地，其年代约距今6000至5500年，属大汶口文化早期。墓葬多为长方形浅坑，长约1.7—2.3米，宽约0.5—1.3米。约有20%的墓随葬有日用器物及仿制的明器，随葬品以陶器为主，个别的墓还随葬具有特殊含义的龟甲和獐牙等物件。大多数的墓葬是单人仰身直肢葬。约30座墓是仰身直肢的合葬墓，合葬者少则2人，多则5人，大多数是同性合葬。二次葬墓约200座，分为单人和多人两种，二次多人合葬墓的埋葬形式与关中地区仰韶文化的二次多人合葬墓的相同，少则2人、多达24人，但这里的合葬者大多为同性，一般无随葬品。史前同性合葬墓最早发现于关中地区的仰韶文化中，而迄今发现数量最多的则是地处黄河下游的王因墓地。墓中的成年人骨通常被拔除上侧门齿，枕骨、颌骨也都被人工变形，这是大汶口文化居民生前流行着一种奇特习俗的反映。

1974年至1978年，在青海乐都县柳湾村后山坡上发现了1700多座墓葬，是我

国史前考古中发现墓葬数量最多的一处墓地。墓地位于湟水北岸向阳山坡上，按东西走向的山势分为三个墓区，东、中区以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和马厂类型的墓葬为主，其年代约距今4500至4000年前，西区以齐家文化墓葬为主，其年代约距今4000年左右。

马家窑文化的墓葬约1100多座，大都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部分为洞室墓；而且大小不一，大者墓长约4米、小者墓长约1米。洞室墓在墓道与墓室之间往往插有成排的木棍或木板，以封堵墓室。有的墓用木棺或垫板作为葬具，埋一人的墓以仰身直肢葬为主，部分为二次葬。合葬墓发现较多，一墓葬2至7人不等，都是一次埋入，或并排埋葬，或上下叠压埋葬。这些合葬墓大都是夫妻合葬，或是家庭成员合葬。墓中普遍随葬陶器，大都为彩陶，有的墓陶器堆满墓坑，远远超出个人的实际需要，当是财富的象征。墓中出土的陶器计有万件之多，其中外壁塑成裸体女人像的彩陶壶，是当时的艺术精品，边缘刻锯齿的小骨片是当时记数的体现，发现在彩陶壶上的130多

种符号，表明了当时简单记事的手法。

齐家文化墓葬约 360 多座，这些墓葬亦分为两种，即长方形竖穴土坑和洞室墓。多数墓的葬具是以圆木挖成的木棺，独具一格，有的则使用长方形木棺，木棺一般长 1.7 至 2 米左右，宽约 0.5 米左右。绝大多数墓为单人葬。约 20 多座是 2 至 5 人的合葬墓。二人合葬墓大都是成年男女合葬，男的仰身直肢埋在棺内，女的侧身屈肢埋在棺外。多人合葬墓中，棺内的男性骨骼一般较为完整，而棺外的骨骼大多残缺不全，有的仅剩头骨。绝大多数墓有随葬品，种类有陶器和石、骨器等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以及装饰品。通常有木棺的墓随葬品较丰富，多达 30 多件，无木棺者随葬品则较少，有的甚至无随葬品。这些现象表明当时已经有了明显的贫富分化。

1987 年，在河南濮阳市西水坡发现一座形式奇特的“墓葬”。在墓中部有一具成年男性骨架，大体呈头南足北的仰卧直肢姿式，在其东西两侧有以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在龙虎外侧以及成人足端外侧的三个方位又有三具青少年骨架以及一对腿骨

和一堆三角形蚌壳。这是一座什么性质的墓葬，目前尚不清楚，有学者认为蚌壳龙虎与其外围的三具青少年骨架不是同时埋入的，而与龙骨之间的成年男性骨架则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年代约距今6000年（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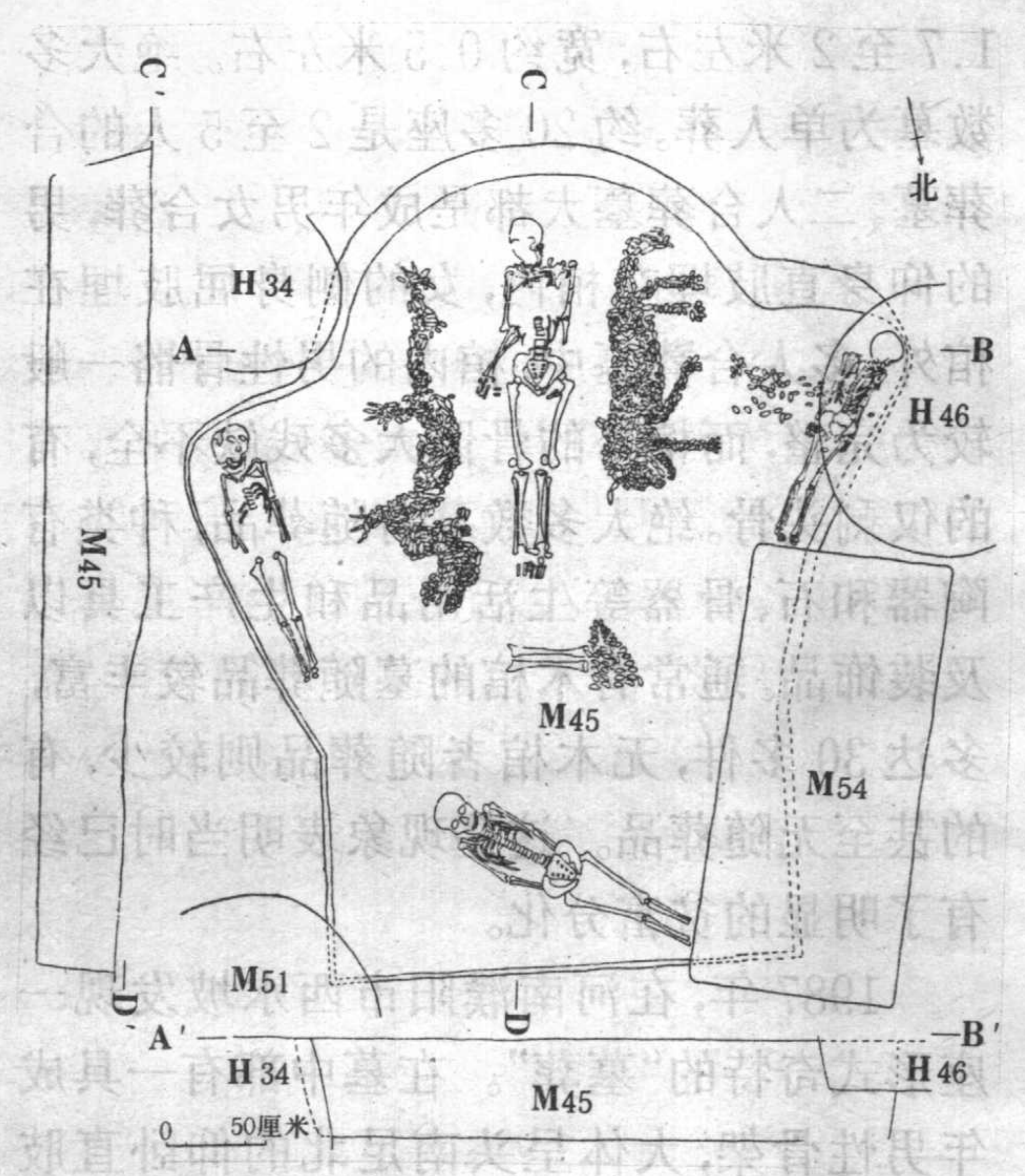


图1 仰韶文化蚌壳摆塑龙虎与人骨平面图

蚌壳龙位于成人骨架的东侧，头北尾南，长1.78米，昂首曲颈、弓躯伸尾，其形

状犹如在腾飞。蚌壳虎位于成人骨架的西侧，虎背与龙背相对，相距约1.5米，亦是头北尾南。虎长1.39米，头微低，尾下垂，四肢交递，其形状好像在行走。这对龙虎都是用未加工的自然蚌壳摆塑而成，整个造型富有立体感。其中龙型图案是迄今所知古人创作的最早的龙形象。

西水坡发现的蚌壳摆塑的龙虎图案共有三组，呈南北一字形排列，各相距约20和25米，第二组还有鹿等动物的形象，第三组的龙背上似骑着一人。对这三组龙虎图案含意的解释，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不过多数学者认为，龙曾作为华夏祖先的图腾崇拜物，虎又似神威权力的象征，第一组龙虎之间的男性成人死后由龙虎伴随，至少表明他生前的身份在当时是受人尊敬的。

5 兴隆洼文化聚落与红山文化坛庙冢

兴隆洼文化聚落址与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存位于内蒙古东部和辽西地区，他们的发现充分展现了距今7000年前和距今

5000年前、西辽河流域的原始文化不仅有别于中原地区，而且是相当发达又具有神密的色彩，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兴隆洼聚落址位于赤峰市敖汉旗宝国吐乡兴隆洼村东南部山梁的西南坡，1983年以来发掘了约1万平方米，是长城以北地区，我国发掘面积最大、年代最早的一处原始聚落址。兴隆洼聚落址呈不规则圆形，直径约166至183米，四周以大沟环绕，沟宽约1.5至2米，深0.55至1米。聚落址内的房址排列大体呈西北——东南方向，共约10排，每排约10组房屋，次序井然。这些房屋都是半地穴式，平面近方形，有的为长方形，大小不一，大的面积约60平方米，小的房屋面积约20平方米。室内设有烧灶，有的房屋内还设有窖穴。个别房屋内还遗存有木炭，可能是房屋木结构部分的残存。房屋内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器，有锄形器、铲、斧、凿、磨盘、磨棒等，也有骨锥、骨匕、鱼镖等骨质工具；生活用具主要是罐、钵等陶器，器形较为简单。兴隆洼聚落址的年代，约距今7000至8000年间，早于关中地区的姜寨聚落址约1000多年。

距今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存，地处凌源、建平、喀左三县境内的大凌河河谷地带。祭坛址位于其东南方的东山嘴后的山梁前端，面临大凌河，并与隔河的一座山口相对；神庙则在祭坛址西北约50公里外名叫牛河梁的山梁之上，其南4公里有一座山势突兀、形似猪首的山头与之遥遥相对。神庙以东是山梁下一片开阔地，环神庙西一南方位的山丘上，分布着十多座积石冢。

1982年发现的喀左东山嘴祭坛址，是以相当讲究的石材加工砌筑而成，占地面积约2400平方米，其内的建筑按中轴、两翼分布。在中轴线的北部是一座方型祭台，东西长11.8米，南北宽9.5米，其内耸立着许多大石条，石条高约85厘米，冲上一头为锥形，排列密集，祭台上出土有双龙首玉璜等物件。中轴线的南部是一圆型祭台，北距方型祭台约15米，直径约2.5米，台内原置有一群小型裸体孕妇塑像和几个大型坐式人物塑像，出土时都倾倒在祭台外侧。这些小型孕妇像，头部大都残缺，高约5厘米，腹部凸鼓，臀部肥大，阴部刻纹清

晰，通体打磨光滑，身上似涂红彩，可能是当时祈求丰产的偶像。大型坐像约当真人的二分之一，头部亦残缺，双手交叉于腹部，盘膝正坐，可能是当时祖先崇拜的偶像。这些距今5000年前的人物塑像，在我国是首次发现，她们坐落在南北方圆对应的祭坛上，应该是当时祭祀的对象，方形祭台中的大石条可能是又一种祭祀对象的象征物。所以这里是5000年前人们从事祭祀活动的中心场所。

牛河梁神庙址位于凌源、建平两县交界处，1983至1985年的发掘表明，其建筑结构比较复杂，由一个多室和一个单室两组建筑组成。多室在北，为主体建筑，南北长18.4米，东西残宽6.9米，主室位于该建筑南北中心部位偏北处，平面略呈圆形，在其东、西、北三面各有一室与主室相通。单室建筑位于多室建筑以南约2米，面积约16平方米。在这组建筑的墙壁上发现有彩绘图案，图案以赭红间黄白颜色交错绘成，有三角形几何纹、勾莲纹等，华丽壮观，是迄今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彩绘壁画。

在主室中除发现有猪龙、禽爪等泥塑

件外，还发现了分属六个个体的人像泥塑残件，有头、肩、臂、乳房、手等。人像大小不一，但都属女性，其中最大的一个位于主室中心部位，约有真人的三倍。在其侧旁发现一个中型人像的头部，保存较为完整，大小与真人相当，其发顶部分缺失，高 22.5、颜宽 16.5、通耳宽 23.5 厘米，额顶发迹平直起棱，眼窝较浅，眼内嵌圆形玉片为睛，炯炯有神，低鼻梁、阔嘴、双唇涂朱，颜面涂红彩，似为蒙古人脸形。这些大小不一的女性塑像大都是坐式，其坐次可能有中心、层次之分，都是当时供奉的女神，可能就是神化了的祖先崇拜的偶像。因此，这组建筑是一座女神庙。

积石冢已发现六处，分别相距神庙约 750 至 1100 米。其中 1983 年在神庙南部发掘的一处有四座积石冢，东西向排列，全长 110 余米，中间的两座，一为方形、一为圆形。方形积石冢东西长 17.5 米，南北宽 18.7 米，残高约 1.4 米，东、西、北三面以大石垒砌外墙，墙上覆盖积石，墙内积石近 3 米宽、1.2 米高；冢中央为一石砌方台，边长 3.6 米，现高 0.65 米，其中心以石板为

椁构成墓室，墓室东西长 2.21 米，宽 0.85 米，高 0.5 米。圆形积石冢位于方形积石冢以东 2 米，由内外三圈淡红色石桩围成，呈内高外低的圆坛，圆坛外圈直径约 22 米，内圈直径约 11 米。这一圆坛可能具有墓祭的性质。在方形积石冢以西 3 米是一长方形积石冢，东西长 26.8 米，南北宽 19.5 米，设有内外石墙，在内墙内侧发现一排 24 件彩绘红陶筒形器，可能具有特殊的用意；在南内墙外，发现石板墓 15 座，这些墓都以竖置的石板或平垒的石块构成墓壁，墓室大小约容身，墓顶以石板或石块封盖，墓中一般以玉器随葬，多者 5 种，种类有玉箍形器、环状玉猪龙、玉璧、玉勾云形饰、玉环等，件件制做精良。

牛河梁积石冢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冢内大小墓有别，是我国发现的距今 5000 年前最大的积石冢群。它们以神庙为中心，成组分布，各居山头，并在 50 公里范围内，与神庙以及东山嘴祭坛一起构成一个具有等级关系的神圣地带，体现了当时在一个广阔的区域内存在着一个富有浓厚宗教色彩、已相当发展的社会组织。

6 河姆渡遗址与良渚文化祭坛

河姆渡遗址位于杭州湾南岸的余姚县河姆渡村东北，1973年在这里发现了一种与黄河流域的原始文化面貌完全不同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其年代早至距今7000年。这一发现改变了只有黄河流域才是中华远古文化摇篮的传统观点。

与黄河流域的半地穴居址形式不同，河姆渡遗址上发现的约距今7000年的建筑是栽桩架板高于地面的木构杆栏式房屋。当时建造这种房屋已使用了榫头卯眼等细木工榫结合的技术，其中燕尾榫、带销钉孔的榫以及企口板的发明，标志着当时木作技术的突出成就。发现的最大一栋杆栏式房屋，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其内分隔成若干小房间，并设有前廊过道。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河姆渡遗址是这种建筑形式的最早发现。

稻是当时的主要栽培作物。稻谷、稻壳、茎叶普遍发现于居址内，其混杂堆积达20至50厘米厚，最厚处超过1米。经鉴

定，主要属于栽培稻籼亚种晚稻型水稻。发现的代表性水田耕作工具主要是骨铲，有上百件，采用鹿、水牛的肩胛骨制成，有的有銎有穿，以捆装木质把柄，还发现有木耜、石斧、石刀、舂米木杵等工具。与农业定居生活相依存的家畜饲养业也有一定的规模。猪、狗的骨骸在遗址中普遍发现，猪的形象还作为丰收吉祥图案标志在陶器上、或被制成陶塑模型。此外，饲养的家畜可能还有水牛。

当时的手工业已有多种门类，除木器、陶器制作业外，还有骨器制作和编结纺织等。编结可能已使用原始腰机，发现的芦苇席残片是采用二经二纬的编织法。制作的骨器广泛使用于生产和生活领域，其中刻有双鸟朝阳图像的蝶形器、凤鸟形匕状器、似蚕纹小盅等，显示了当时的精湛艺术。外表涂生漆的木碗，是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漆器。

河姆渡遗址发现的丰富多彩的稻作农业、家畜饲养业以及手工业遗存，展示了长江下游地区在距今 7000 年前后既拥有已充分发展的农业文化成就，而 1986、1987

年发现的良渚文化的土冢、祭坛与神徽玉器，则进一步表明这一地区在距今4800年前，其原始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后世的神权与王权意识在这里已经有了初步而形象的反映。

迄今发现规模最大的良渚文化人工堆筑的土冢，位于杭州市余杭县雉山村南侧的反山土冢。现存的反山土冢东西长90米、南北宽30米，高4米。1986年在反山土冢西半部发现的11座墓葬，规模都较大，一般长3米，宽约2米，深1.3米左右，墓内原可能有外表涂朱的木棺。每墓都有大量的随葬品，种类有陶器、石器、象牙器、漆器、玉器等，其中被后世视为珍贵礼器品的玉器成批出土，最多一墓有170件(组)，铺满墓室。在出土的3200多件玉器中，种类主要有琮、钺、璧、璜、佩、镯、冠饰、三叉形器、瑗、牌饰、杖饰、带钩、串珠以及鸟、鱼、龟、蝉等，大都精美绝伦。其中琮、钺、璧等玉器是当时的高级礼仪用品，最大的一件玉琮，高17.6公分，重达6.5公斤，是迄今发现的玉琮之冠。

发人深思的是，在琮、钺、冠状饰以及

三叉形器等玉器上，通常雕刻有繁褥的图案装饰，其中最主要的一种是繁简不一的神像图案。完整的神像图案为阔嘴露齿、宽鼻、圜目睁睛，满首羽冠飘然，耸肩叉腰、腰系饰带，鸟足蹲踞，全身以兽面纹装饰。这种神像有的极小，需借助放大镜方能观察，但刻纹线条流畅、细如毫发，体现了距今4800年前太湖地区的玉雕技艺已达到极高的境界。整个神像图案似神人兽面结合，表现了威严无比、气贯长虹的气概，充满了良渚人的信仰与追求。将这种神像雕刻在玉琮、玉钺等重器上，由当时的上层贵族所执，充分表明这种神像可能是良渚文化的神徽。

良渚文化的祭坛墓地位于反山土冢东北5公里的瑶山上。祭坛经过精心设计，为近方形的漫坡状，边长约20米，面积约400平方米，以不同的土色分为内外三重。中心为红色土方台，四边长约6至7.7米，红土外围为灰色土填充的围沟，灰土围沟外是用黄褐色斑土筑成的围台，围台面铺砾石，边缘以砾石迭砌。这座祭坛由多色土构成，衬托了祭祀场所的神密色彩，开创了

后世多色土祭坛建筑的先风。

祭坛上分两排埋葬着12座墓，各墓都出有成批玉器，其中以埋在中心红色土台上的墓葬出土玉器最多，有的多达148件（组）。这批玉器制作精良，种类有富有神秘色彩的玉琮，透雕玉冠、冠状饰、三叉形器等，其上也大都雕刻有神徽，使人望而生畏；还有象征权力的玉钺、龙首牌饰；也有鸟、璜、带钩等装饰品和嵌玉漆器等高级用品。这些墓主生前很可能是祭祀苍天、大地、神灵的祭师或巫觋。

反山土冢与瑶山祭坛墓地的发现，充分显示了距今4800年前的良渚人的精神世界与辉煌灿烂的物质文化，良渚文化的社会在那时已经进入了高度发达的时期。然而，良渚文化成就的消失如同它的发现一样引人瞩目。太湖地区在良渚文化以后的近千年内，还没有发现可与发达的良渚文化成就相比拟的文化遗存。良渚人创造的文化精华，在良渚人之后流向了何方呢？

7 距今四千年前的几处城址

距今4000年前的城址，这是近年来最

为引人瞩目的发现。目前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已发现了五座，它们分别位于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偃师郝家台、山东寿光边线王、章丘龙山城子崖，都属于龙山文化时期。这些城址的发现对于探索我国城市的起源、国家与文明的起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王城岗城址位于登封县告成镇西约1公里的台地上，1977年至1981年的发掘表明，它是由东、西并列的两座城址组成。东城的城墙大部分已被河流冲毁，其中残存的南墙西段长约30米、西墙南段长约65米，南墙与西墙垂直相交。东城的平面可能是正方形。西城与东城合用一城墙，东城的西墙就是西城的东墙。西城的南墙与西墙的基础槽以及筑墙夯土层尚存于地下，其中西城墙基础槽口宽4.4米，底宽2.54米，深2.04米，夯层厚度约10至20厘米。南墙长82.4米，西墙长约92米，北墙的东段亦被河流冲毁，其西段残长约29米。西城的西南城角与西北城角都接近90度，表明西城平面也是方形，其面积约10000平方米。在西城的南墙东部与东墙

南端，有一约10米宽的缺口，这可能是西城的南门遗迹。从两座城址的残存情况分析，西城可能是在东城被毁之后建筑的。

在王城岗城址内已发现有多处夯土建筑遗迹，但都遭破坏，原貌不辨。此外还发现一些经夯筑的圆形土坑，坑内填埋有成年人和儿童的骨架，少者两具，多者七具，有的数坑相连一次填夯。这种现象可能与重要建筑遗迹有关，属奠基坑。王城岗城址的年代约早至距今4300年，该城址面积不大，其职能可能是作为防御作用的城堡。

平粮台城址位于淮阳县东南4公里的大朱庄西南，面积约5万平方米，高出附近地面约3至5米，其年代早至距今4300年。1979年和1980年的两次钻探、发掘表明，该城址平面呈正方形，长宽各185米，城内面积约34000平方米。城墙系采用小板筑堆筑，即先在城墙的内侧夯筑一高1.2、宽0.8至0.85米的小板筑土墙作为城墙的内壁，然后在其外侧堆土夯实，逐层加高到超过小板筑墙的高度，再堆筑出城墙的上部。城墙残高3米多，顶部宽约8至10米，底部宽约13米。已发现南北两门，

均位于南、北城墙的中部。其中南门设有东、西门卫房，门卫房依城墙用土坯垒砌，房门相对。门卫房南北长 4.2 至 4.4 米，东西宽 3.1 至 3.3 米。东西门卫房之间为城门通道，宽约 2 米。在门道之下设有排水系统，即在门道下挖一条北高南低、上宽下窄的沟渠，沟渠上口宽及深各约 74 公分，沟渠内铺三条陶质排水管道，沟底铺一条，其上并列铺两条，管道周围以料礓石和土填实，其上再铺土作为门道路面。发现的排水管道残长约 5 米多，是多节套接而成，每节长 0.35 至 0.45 米不等，近直筒形，一端稍细、径为 0.23 至 0.26 米，另一端较粗、径为 0.27 至 0.32 米，每节管道小口朝南，套入另一节管道的大口内，如此节节套扣。这是我国发现年代最早的城市排水系统。

平粮台城址内已发现十多处长方形排房建筑址，这些房屋有的是平地起建，有的为高台建筑，普遍使用土坯作为建筑材料。其中位于城内东部偏南的一处排房为平地起建，东西长 12.5 米，南北宽 4.34 米，土坯墙宽 0.34 米，分作左、中、右三室，三室各有一向南开的门，门宽 0.7 米，南北屋墙

外设有散水坡。城内出土的遗物大多为陶器，引人注目的是，在一个灰坑内发现了一块铜渣，表明当时已初步掌握了冶铜技术。

边线王城址位于寿光县孙家集镇边线王村北部的高土阜上，通过1984年至1986年的三年发掘，发现该城址是由里外两座城组成，外围的大城是在里面的小城被破坏之后就地扩建而重新建造的。小城址位于大城址中部稍偏东南，平面为圆角方形，每边长约100余米，面积约10000多平方米，设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道。大城址平面亦为圆角方形，每边长约240余米，城内面积约57000多平方米。在四边城墙的中部各开一城门道，其中已发掘的西、北两个城门的城墙缺口，宽度相同，约10米左右。城墙夯筑而成，仅发现城墙基槽部分。城墙基槽的构筑工程浩大，为斜坡沟状，深约6至7米，口部宽约7至8米，最宽处约有10余米，基槽逐层填土夯实，夯层厚约5至15厘米不等。在基槽夯层内还发现了埋置有人、狗、猪的骨骸和陶器的小墓坑，这是在筑城时特意埋入的，可能与奠基习俗有关。

城子崖城址最早发现于1928年，1990年的发掘表明，城子崖城址实际上是三座，分别建于周代及其以前的三个时期。其中最早的一座属龙山文化时期，面积最大，平面近方形，东西宽430余米，南北最长约530米，占地约20万平方米。城墙部分已被破坏，但四面城墙墙基尚完整地保存于地下。东、南、西三面城墙较为规整，北面城墙弯曲并向北外凸。残存的城墙距地表2.5至5米，残宽8至13米。城子崖城址比边线王城址和平粮台城址大三四倍，比王城岗城址大20倍，是迄今发现的距今4000年前规模最大的城址，它的性质可能已超越了主要作为防御作用的城堡的范畴。

二　夏商周时期

1 夏文化探索与陶寺遗址、二里头文化

中国历史上在商代之前有个夏王朝，但在考古学上夏文化却长期是个空白点。因此，探索夏文化问题，是关系到中国国家产生的重大课题，引起考古、史学界普遍关注，希望能用考古手段去证实和补充夏代的历史。根据文献记载，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包括：晋南的汾、浍、涑水流域，豫西的伊、洛、颍水流域，乃至关中平原，均为探索夏文化的重点地域。主要分布于豫西地区的二里头文化曾被作为探索夏文化的研究对象，近年来，晋南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将有助于夏文化探索的进一步突破。

陶寺遗址

陶寺遗址位于山西省襄汾县城东北崇山（俗称塔儿山）西麓陶寺村南，面积达300万平方米。这一文化的分布范围，均在

汾河与浍水流域，正是“夏墟”之地。遗址的年代经碳14测定，约当公元前25—前18世纪，经历600余年。与夏纪年基本相符（夏纪年应从公元前24—前18世纪）。也有的学者认为是陶唐氏（唐尧）文化遗存。

遗址从1978年开始发掘，它包括居住址与墓葬两部分。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具有显明的自身特点。

在房址中，有地面起建、半地穴式与窑洞式三种。房址平面多作圆角方形，也有圆形。房内地面多为烧土面，也有石灰面。长、宽一般在2—3米。大型房址尚未发现。但已发现夯土碎块和刻画几何纹饰的白灰墙皮，从而提供了曾有大型建筑基址的线索。房址附近有圆形水井，深达13米许，近底部有护壁木构。还有石灰窑址，烧制石灰，用作建筑材料。

陶寺龙山文化有两大特色：一是出土绚丽的彩绘陶器。在陶壶、瓶、盆、盘、豆的器壁上大都施以彩绘。或以黑陶衣为地，或以红色为地，上施红、白、黄彩。纹饰有龙纹、变体动物纹以及圆点、条带纹。其中彩绘蟠（pán盘）龙陶盘，最具特征。二是出土

成批的彩绘木器。这些木器的胎骨都已朽没。依其残存的彩绘颜料层得以剔剥出原来的形状。已知有案、几、俎(zǔ 阻)、匣、盘、斗(勺)、豆、"仓形器"、鼓等多种器形。并运用榫卯和木板拼接技术,还能作弧线处理。木器上的彩绘,是以涂红为地,以黄、白、蓝、黑诸色绘出五彩图案。其中木鼓系以树干挖空制成。圆形鼓腔外施彩绘,以鳄鱼皮蒙鼓面。最大的一件,通高 1.04 米,上口径 43、下口径 57 厘米。即古文献中所称之"鼍(tuó 驮)鼓"。在墓内木鼓与石磬(qìng 庆)(特磬)共存。特磬,长 80—90 厘米,石灰岩打制而成,作倨句型。这木鼓与特磬,是我国目前同类乐器中最早的珍品。

更值得注意的是,铜器与"文字"的出现。在一座墓中出土一件铜铃形器。经化学分析,含铜量 97.8%,系用复合范铸造的红铜器。证明当时已掌握冶金技术。在居住址中出土的一件陶扁壶器壁上,有毛笔硃书字样,其结构与甲骨文同形字十分相似。说明当时文字已经产生。

陶寺墓地已发掘 1300 多座墓。墓葬可分为大、中、小三种。小型墓最多,中型墓次

之，大型墓最少。

大型墓9座，墓坑长方形，长3米，宽2米左右。彩绘木棺，棺底铺垫硃砂。墓主均为男性。随葬物最多达200多件。有彩绘陶器、彩绘木器、彩绘蟠龙陶盘、玉石器、武器、装饰品。还有整猪骨架等。

中型墓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墓主为男性。使用木棺，有的棺内铺硃砂。随葬有成组陶器（包括彩绘陶器一、二件）、少量彩绘木器、玉石器以及猪下颌骨等。二是墓主为女性。用彩绘木棺、对称地分葬在大型墓左右两侧。随葬彩绘陶瓶、佩戴玉石镶嵌的头饰和臂饰。

小型墓多无木质葬具。有的用帘箔卷尸。大多数无任何随葬物。有的只随葬骨笄一、二件。

上述陶寺墓地的显著差别，是部族内部贫富分化和等级差别最直接的反映。一个特权阶级产生了，最初的阶级压迫出现了。加之，社会分工进一步多样化与专业化。铜器的铸造以及文字的应用。标志着在华夏大地上已经放射出文明时代的灿烂光芒。

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县。在今洛河南岸(洛河故道在遗址之南)。正处于伊洛之间。二里头文化是以二里头遗址命名。其早期文化的年代大致在公元前19—前18世纪。这与夏朝晚期的活动地域与时间大致相符。所以,把它作为探索夏文化的对象之一。

根据遗址的地层关系及典型陶器的排比,目前暂可分为四期。第一期陶器的特点,褐陶为主,磨光黑陶占一定比例,纹饰以篮纹为主,少量的方格纹、细绳纹,器型多为宽折沿、小平底。具有河南龙山文化色彩。第二期陶器的特点,磨光陶、棕褐陶、黑衣陶相当多。纹饰以细绳纹为主,器形多窄卷沿和圜底。出现簋(guǐ 鬼)、鬲(lì 立)、大口尊等。第三、四期陶器特点相仿,以灰陶为主,内壁有麻点。纹饰以粗绳纹为主,器形多卷沿和圜底。有些器型如鬲、斝(jiǎ 甲)、大口尊等与商代中期同类器十分接近。这种器形在第四期中表现出融合的趋势。因此,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早期(一、二期)可能是夏代晚期文化,而它的晚

期(三、四期),则是商代早期文化。

关于二里头文化性质问题,目前学术界的看法颇有分歧。主要有以下几种意见:

(1)认为二里头文化的早期(一、二期)遗存可能是夏文化。由于在第三期遗存中,出现一组与商代中期文化典型器相同或相近的器物,表明其年代已进入商代。

(2)认为二里头一至四期遗存均早于郑州商城。郑州商城为商汤所都之亳(bó勃)。所以,整个二里头文化都是夏文化。

(3)认为二里头一期文化可能是商汤灭夏之前的夏文化。从二期起,为商代早期文化。

(4)认为二里头文化一至三期遗存联系密切,应是夏文化。

这一学术问题,仍在继续讨论中,也将寄希望于新的考古发现。

2 二里头遗址与偃师、郑州两座商城

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与郑州商城,是商代考古中最重要的新发现,使商文化的研究从盘庚以后的殷墟提早到商代前期。

其中，二里头晚期宫殿应为商汤灭夏之后所建的宗庙遗迹或为其行宫。偃师商城应为汤都西亳。郑州商城应为仲丁所迁之隞(áo 敖)城。这三者关系表明了商代前期历史情况。

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古史学家徐旭生调查时发现的。它的发掘，可为夏文化探索提供部分资料，为早商文化研究开辟途径。今在其晚期地层中发现两座大型宫殿基址。

1号宫殿基址位于遗址中部，坐北朝南(方向352°)、东西长108米，南北宽约100米。平面略作方形，全部夯土筑成。在基址中部偏北处，有一略高的长方形殿堂基座，东西长36、南北宽25米。建在基座上的殿堂，东西长30.4米、南北宽11.4米。四周有一圈大柱洞或柱础石。经复原研究，本为面阔8间、进深3间的“四阿重屋”式殿堂。殿前庭院的面积约5000平方米。围绕殿堂和庭院的四周是廊庑建筑。殿堂正南约70米处，即夯土台基南部边沿中段，是宫殿大门。这种建筑形式，基本具备我国宫

殿建筑的形制和规模。值得注意的是，在殿堂基座的西北隅台基上面，发现墓葬10座，死者双手被捆绑，有的用陶簋、罐、瓮随葬，有的坑内有人骨架和兽骨。显然系被迫致死或与祭祀有关。

2号基址位于1号基址东北约150米，形制彼此近似。同样是包括廊庑大门、中心殿堂的一组建筑。但中心殿堂的面阔9间，进深仍为3间。全组呈长方形，东西宽58米，南北73米。还发现地下水道，用陶管将庭院内的水排出。它与1号基址不同的是，中心殿堂后有一座大墓。墓的中线与南大门南北对应。大墓为长方竖穴，墓口东西长5.35米，南北宽4.25米、深6.1米，被盗一空。此墓年代与2号宫殿同属二里头遗址晚期。因此，2号宫殿应为宗庙之类建筑。

二里头遗址还发现数十座大小不等的墓葬，除一座大墓位于2号宫殿基址北面，已被盗掘一空外，中型墓出土一批青铜器、玉器、漆器等珍贵文物，小墓则主要出土陶器。

遗址中出土的青铜礼器有爵、斝、盉

(hé 禾)、鼎。复合范铸成，整治不精，素面无纹，或仅有简单花纹，具有早期铜器制作的特点。其中，铜爵发现较多，为薄胎、束腰、平底。较早的素面无柱，较晚的有小柱。

出土精品有：圆形铜牌饰，直径 17 厘米。用绿松石镶嵌为似钟表刻度形，中间镶成两圈每圈十三个十字形。盾形兽面纹铜牌饰，长 14.2、宽 9.8 厘米。凸面由许多绿松石片粘嵌成兽面纹。图案组合十分精彩。这是我国目前最早的镶嵌工艺杰作。兽面玉柄形饰，通长 17.1 厘米，柄部宽 1.8 厘米。外形似鞭，共分六节，粗节有兽面纹、末端用线刻和浮雕法琢成兽头形，造型优美。石磬和铜铃，是研究音乐史的重要资料。

在陶器上还发现刻符 20 多种，有的刻符与甲骨文中同类字相似，当属文字范畴。

二里头早商遗址，有着宏大的宫殿宗庙，精美的铜器、玉石器和陶器等，这是商代早期所创造的辉煌之民族文化，为后来殷周文化的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

偃师商城遗址

1983 年发现并进行发掘的偃师商代城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县城西，北依邙山，

南临洛水(洛河改道北移)。西南距二里头遗址约六公里。正处于河洛之间平原上。《汉书·地理志》偃师条下班固自注:“尸乡,殷汤所都”。近年来,在城址北面,北邙山下杏园村,出土唐朝垂拱八年(公元685年)墓志:“访旧瘗(yì益)于北邙,祔新茔于西亳”。另一唐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墓志:“葬于偃师亳邑乡”。这表明,汉唐以来,确指今偃师商城所在,即西亳之地。

城址都已湮没于地下,经钻探判明平面略呈长方形。东南角地势低洼,东城墙南段内折向西南,再折向南,依地势筑城。除南城墙没于洛河之中,现正在探寻外,其余三面城墙基本完好。一般宽17—20米。城的范围比郑州商城略小。方向为北偏东7度。南北现长1710米,东西宽1215米。总面积约近200万平方米。城市布局,展示了早期都城的轮廓。东西城墙上各探出三座城门,北城墙已探出一座城门。现已发掘其中两座。

“西二”门,门道全长16.5米、宽2.4米。两壁各有一条紧贴城墙的夯土窄墙,墙内排列着密集的柱洞,洞底大多垫有暗础。

门道内路土厚约 5 厘米。从城门内侧往南约 4 米处，有一条夯筑“马道”。上宽 3 米，下宽 4 米。它与西城墙呈 90 度垂直相交，全长约 30 米，东端与城内一条东西向的主干大道相连。“马道”斜坡式，东低西高，直抵城墙，正合登城之用。

“东二”门，门道全长 19.4 米，宽 2.4—3 米。两壁紧贴城墙的木骨泥墙内残留柱洞痕迹。在门道路土下，有一条地下排水沟，宽约 1.2 米，深 1.3 米。沟底用石块砌成鱼鳞状。两壁以石块砌成石柱，柱间夹立木柱，承托木盖板。西自宫城，东出东城门，全长 800 多米。这种木板盖、石壁柱、鱼鳞状石底的下水道，尚属首见。

城内道路纵横，已探出东西向大路 5 条，南北向大路 6 条，路面一般宽约 6 米，最宽达 10 米，道路与城门方位基本对应。

城内中部偏南有三座小城，居中处的宫城，平面近方形，周长约 800 余米。南墙正中是宫城大门。门前一条大道直往城南。形成一座独立的小城。

宫城中部是主殿基址，两侧又有大面积的建筑基址，形成相当壮观的大型建筑

群。1984年在宫城内东部即主殿东侧，发掘两座保存完整的宫殿基址（编号为D 4、D 5）。

四号殿址位于宫城东部偏北，东西长51米、南北宽32米。坐北朝南，方向北偏东8度，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宫殿建筑。正殿建于夯土台基上。东西长36.5米，南北宽11.8米。南部边缘有四个长方形台阶。殿堂的东、西、南三面廊庑环绕，中有宽阔的庭院。院内殿址东北有一口水井。又在殿基的东北、东南与南庑南面共发现三处石砌排水沟，是宫城中的重要排水设施。

五号宫殿建筑包括上、下两层宫殿基址。位于宫城东南隅，在四号基址之南约10米。上层殿址的建筑形式与四号基址有相似之处，也是由正殿和东、西、南三面廊庑组成，中有庭院。而其不同之处，五号正殿四周有柱洞和础石，东西两侧有庑址。而规模也较大。东西现长54米，南北宽14.6米。殿址南侧的地面下，发现排成一线的4对狗坑（其中1个遭破坏）。每坑狗骨架1只，或蜷屈、或侧卧，头皆向南，应为祭祀坑。下层宫殿基址平面呈"□"字形，中间有

方形庭院。

根据地层关系和碳14测定年代数据，经树轮校正年代为：(1)公元前1650年，(2)公元前1680年。据此，这座城址的始筑年代，早于郑州商城，约当公元前17世纪，即商代早期。该城既有大型宫殿建筑群，又有军事防御设施，具有早期都城的规模和特点。因而，我们认为，此城址应是商汤所都之西亳。也有的学者认为此城址为商太甲被放逐时所居之桐宫。

郑州商城遗址

1952年在郑州二里冈发现的商代遗存，具有明显的特点。经发掘，确切的地层关系证明它比安阳殷墟要早。后经碳14测定年代，距今(树轮校正)3570±135年，即公元前1620年。属商代中期。

1955年发现商代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周长近7公里，一般称之为郑州商城。东城墙和南墙均长约1700米，西墙长约1870米，北墙长约1690米。墙体用土分段分层夯筑。墙基一般宽10—20米。城周共发现11个缺口。推测“有的缺口可能与城门有关”。

城内为宫殿区和一般居住区。城郊有手工业作坊和墓葬区。宫殿区在城内中部偏北和东北部一带。已发现夯土基址 20 余处。现已发掘 3 处。其中最大的一处，东西 65 米，南北 13.6 米，用黄土夯成的房基面上存有两排长方形柱础槽。大致可复原为一座九室重檐顶并带回廊的大型寝殿。

城址周围发现手工业作坊遗址 4 处。铸铜作坊遗址在城南墙外和北墙外各发掘 1 处。发现有铸铜用的坩锅和陶范等。陶范包括有镢(jué 决)、铲、斧、刀、凿、铲等工具范，方鼎、圆鼎、鬲、斝、爵、觚(gū 姑)、尊、罍等容器范，以及镞、戈等兵器范。

制陶作坊遗址在西城墙外发掘 1 处，发现陶窑 14 座。出土陶拍、杵、印模等制陶工具。印模上刻有兽面、夔(kuí 奎)龙等纹饰。制骨作坊遗址在北城墙外发掘 1 处，出土骨料中除牛、猪骨外，还有人的肢骨。此外，在城西杜岭和城东南角各发现 1 处铜器窖藏。杜岭铜窖出土两件大方鼎，其中一件高 1 米、重 86.4 公斤，是郑州商代遗址中出土最大的一件青铜容器。另一件高 87 厘米，重 64.25 公斤。城东南的窖藏出土铜

器13件，包括大方鼎2件，大圆鼎1件。扁足圆鼎、觚、牛首尊各2件，羊首罍（lěi垒）、提梁卣（yǒu友）、盂和盘各1件。其中大圆鼎、提梁卣，在郑州商代遗址中属首次发现。

郑州商城附近尚未找到当时的大型墓葬，仅在城址周围的白家庄、人民公园、南关外等处发掘100多座中小型墓。白家庄的一座中型墓中，出土铜鼎、盘、罍、斝、爵各1件。另一座墓则出铜鼎3件、铜斝、觚各2件，铜爵、罍各1件。墓内棺顶周围土台（"二层台"）上还殉葬一个奴隶。

遗址中出土占卜甲骨较多，但刻字者仅有2片。在陶大口尊口沿上常有刻划陶文。还出土原始瓷器、陶塑猪、羊、龟、鱼、虎头、人坐像等制品。

近年来，还在郑州市西北郊发现1处商代中期夯土基址（宫殿），出土青铜建筑构件，造型别致，加工精细，属铜锡合金。重达6公斤，正面方形、平面"凹"字形，正面饰单线阴纹兽面，两侧各有一组龙虎斗像图，为商代遗址中罕见精品。也是我国迄今最早的青铜建筑构件。还出土特磬、石圭

等。

郑州商城的面积较大，有大型夯土台基和许多手工业作坊，出土大型青铜礼器，表明它是商代中期一座都城遗址。依古文献，应是商仲丁所迁之隞城。也有的学者认为是商汤所居之亳都。

3 安阳殷墟宫殿基址与妇好墓

殷墟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洹河两岸。为商代后期王都遗址。以小屯村为中心，面积约24平方公里。公元前14世纪盘庚迁都于此。至商纣亡国，“更不徙(xǐ 喜)都”。周灭殷后，逐渐沦为废墟，故称“殷墟”。20世纪初，因寻找甲骨的出土地而导致殷墟的发现。如果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那么，殷墟的考古发掘就应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新起点。

殷墟的发掘工作，肇始于1928年。1937年因抗日战争爆发而中断，曾进行过15次发掘，发现了许多重要遗迹，取得了较大收获。在小屯村一带，发现50多座夯土建筑基址，获得22000多片甲骨文和其他珍贵文物。又在侯家庄西北冈一带发掘

10座规模特大的商代陵墓，以及上千座“人牲”祭祀坑。从而为中国考古学和中国上古史的研究，特别是商代考古和历史的研究，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科学资料。

1950年以来，殷墟的考古发掘持续进行，不断有重要的发现，同过去相比，新的学术进展主要是，进行了殷墟文化的分期和断代研究，对殷墟的范围和布局也有新的认识。特别是在小屯村的西、南两侧，发现全长750多米的壕沟，壕沟两端与洹河河湾相接，形成平面长方形的防御范围，犹如一座“宫城”。发掘许多夯土基址的宗庙宫殿区，即在这个防御范围的东北隅。40年来的重要发掘有：小屯村北的大型宫殿基址，小屯南地的甲骨坑、苗圃北地的铸铜遗址、后冈祭祀坑。大司空村南地的贮存骨料的窖穴和与制骨有关的居住遗存，等等。考古收获是很大的。随着殷墟发掘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对商代后期的研究，也就逐渐展开。甲骨学，商代青铜器，商代的人殉与人牲、商代手工工艺水平。墓葬制度以及商代社会性质等课题，有的已取得了可喜成绩。

近几年来，殷墟考古的重大收获，应是“匚”形宫殿墓址和妇好墓。

在以小屯村东北地为中心的宫殿宗庙区，已发掘夯土基址53座。但在1989年发现的“匚”形基址三排房基连为一体的建筑，却是首次发现。

“匚”形殿址，濒临洹水。面积约5000平方米。建于殷墟早期。平面呈“匚”字形。缺口向东。北、南有两排并列房基，西面有与之相衔接的房基，三排房基紧相衔接，构成一个整体。北排房基，东西长约60米，南北14.5米。南排房基，东西长约75米，南北7.3米。西排房基，南北约50米，东西7.5米。这三排房基中，北排房基应为主要建筑。现存三个门道，均宽2米，间距4.3米。中间门道西侧埋有东西排列的两个陶罐。东侧陶罐紧邻柱础石，西侧陶罐内发现一件有“武父乙”铭文的封口铜盉。“武父乙”，大概指殷王武丁之父小乙。在另一门道的西侧还发现两个东西排列的祭祀坑。两坑间距0.6米，均殉葬砍头人骨架三具。头骨仍置坑内，头向东。并随葬盆、罍、尊等陶器及骨镞等器物。这种三排房基联成一

体的建筑结构方式是少见的。对商代建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殷墟发掘的墓葬已近2000座。其中以武官村大墓规模最大。平面呈“中”字形，面积约340平方米。内有殉人41个。还有平面呈“甲”字形大墓。这些大墓都被盗掘。1976年发现的妇好墓，规模并不很大，而随葬物非常丰富。它是目前唯一能与甲骨文相印证，断定墓主的明确身份与墓葬确切年代，并未被盗过的商王室成员墓。这在殷墟考古史上是仅有的。

墓为长方形竖穴。南北长5.6米，宽4米，深8米。墓室上部有一块与墓口大小相似的夯土房基，可能是用于祭祀的建筑。葬具为木棺，木椁。椁长5米，宽3.8米，高1.3米。椁室在潜水面下，大部分塌毁。漆棺与墓主遗骸均已腐朽，棺上附一层麻布和薄绢。墓内殉葬16人。腰坑（墓主腰部下的土坑）内1人，东壁龛2人，西壁龛1人。椁顶填土中4人，在椁内棺外的8人。另外，殉狗6只。腰坑中1只，椁顶上5只。

随葬品共计1928件。有铜器、陶器、骨器、玉石器、象牙器、蚌器等。还有贝6800

余枚、海螺2枚。填土中有陶爵、玉毁(guī归)、石磬、象牙杯、玉臼、石牛、骨笄、箭镞等。椁内放置铜礼器。棺内主要放置玉器和贝等器物。

青铜器共460余件。其中礼器210件，其次为武器、乐器、工具、杂器。铜器上不少铸有铭文，其中以铸“妇好”的铜器数量最多，计有109件。铜礼器有：方鼎、圆鼎、偶方彝(yí仪)、三联甗(xiàn献)簋、尊、方罍、壶、瓿(bù部)、缶(fǒu否)、觥(gōng公)、斝、盉、爵、觚、盘等。器类齐全。其中，偶方彝、通高60厘米、通长88.2厘米、重71公斤。上部形似殿堂屋顶，器底铸有“妇好”铭文。三联甗，由长方形六足甗架和三件大甑(zèng赠)组成。在甗架、甑内壁及耳下，各铸“妇好”铭文。以及一对“妇好”鸮(è饿)尊和一对“司母辛”四足觥，这都为前所未见的珍品。

铜兵器130件，其中铜钺4件、二大二小。大者通长39.5、宽37.3厘米，重9.5公斤。上铸“妇好”二字。铜戈90多件。还有铜锛、凿、刀、铲等44件。铜铃18件。

铜镜4件。圆形，镜面直径分别为

12.5、11.7、7.1 厘米。它比甘肃齐家文化出土的铜镜要晚近千年。但也说明商王室已用铜镜。

玉器 750 件，经鉴定，有 300 件软玉。大部份是新疆玉。也有辽宁岫(xiù 秀)岩玉。有琮、圭、璧、环、璜、戈、矛、戚、钺、斧、铲、臼、杵、盘、梳等。均为浮雕和圆雕制品。特别是玉雕人像和人头像，一件跽(jì 季)坐玉人，盘辫、戴冠、着交领衣、长袖窄口、腰束宽带、着鞋，神态倨傲，似是贵族。另一件跽坐玉人，头梳小辫、着衣、赤脚，似是女奴形象。造型多样，线条流畅，堪称商代玉器的精品。

玉雕动物形象：兽类有：虎、象、马、牛、羊、熊、猴、兔；鸟类有：鹤、鹰、鹦鹉、鸽、鸬鹚、燕、鹅；昆虫类有：蝉、螳螂。还有龙、凤、怪兽、怪鸟、蛙、鱼、鳖、石龟等。其中鹤、鹰、鸽、鸬鹚、螳螂的造型，在殷墟尚属首次发现。

象牙杯 3 件。其中一件带流虎鋬(pàn 判)杯，通高 42 厘米。杯身用中空的象牙根段制成。通体雕刻鸟、饕(tāo 涛)餮(tiè 帖)和夔纹，并衬以雷纹。杯鋬下端立雕虎形。

可称罕见瑰(guī 归)宝。

妇好之名常见于武丁时卜辞中。她曾多次征伐夷方、土方、羌方、𢀛方、巴方等方国,是个显赫女英雄。据卜辞和铜器铭文,推断墓主妇好系武丁之妻。墓的年代属殷墟二期。约公元前13—前12世纪。

4 盘龙城、新干商墓与三星堆祭祀坑

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与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为殷商时期的南方考古揭开了新篇章。

盘龙城遗址

盘龙城遗址位于湖北省黄陂县叶店乡的盘龙湖畔。城址营建于公元前15世纪,属商代中期。1954年发现,1974—1976年发掘。

城址的平面略呈方形,南北约290米,东西约260米。城墙夯筑技术与郑州商城相近,以每层厚约8—10厘米的夯土筑出主体墙。墙基宽21米。四面城墙的中部各有一个缺口,可能是城门。城外有宽约1.4米、深约4米的城壕。在城南壕沟底部有桥

桩柱穴，可知当时是架桥通过壕沟的。这座城址的面积较小，城内仅有宫殿基址，实属宫城性质。城外则是居住区、手工业作坊区和墓葬区，反映了早期城市的形态。

宫殿基址发掘两座。

1号殿址高出当时地面约20厘米，坐北朝南，平面长方形，长39.8米、宽12.3米。四周外沿各有一排大檐柱穴，檐柱径约50厘米，柱底垫有大础石。整个建筑面阔38.2米，进深11米。经复原研究，为“四阿重屋”形式的殿堂。中心部位是四间东西并列的居室，四壁为木骨泥墙。四室通面宽33.9米，进深6—6.4米。中间两室较宽，各室南面各有一正门，中间两室北壁又有后门。在四室与檐柱之间，形成一周外廊。

2号殿址位于1号殿址之南约13米。平面长方形，，东西27.5米，南北10.5米。建筑技法与1号基址相同。可能是一个大厅的“前朝”部分。在基址西侧还有陶管相接的地下水道设施。

在城址之南的王家咀，城北的杨家湾。城西的楼子湾和城东的李家咀等地，都发现同时期墓葬。其中以李家咀的两座墓随

葬品最丰富，有精致的雕花木椁，外壁阴刻兽面纹、云雷纹。阴线内涂朱，余者涂黑。随葬品有鼎、鬲、甗、簋、盘、罍、盉、觚、爵、斝等青铜器23件。钺、戈、矛、刀、斧、锛、凿等青铜武器和工具40件。还有玉、戈、笄等。陶器有鬲、罐、大口器及印纹硬陶尊、瓮。铜器形态及纹样属商代中期风格。墓内还殉葬人，一被肢解，一为小孩，另一成人。这座墓是湖北地区商代墓葬中规模最大，随葬品最多的一座。可能是盘龙城的最高统治者之墓。

盘龙城遗址，无论从城墙夯筑技术，陶器特征、青铜工具、玉器风格及埋葬习俗等方面，虽有一定的地方性特点，但与郑州出土的商代中期文化具有明显的一致性。总的说来，属于商文化系统。当地应是商王朝在长江之滨的一个重要方国。

新干商墓

本世纪70年代初期，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的发掘，曾引起考古界的关注。出土遗物，虽在某些方面有它自身的特点，但大部份陶器与中原地区的商文化有密切的关系。最近，又在清江南面不远的新干县发现

一座出土大批青铜器的商代大墓。墓内同出的各种陶器与吴城文化二期的同类器型完全一样，应属吴城文化。这对于重新认识殷商时期当地青铜文化的发展，及其与中原地区的密切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

新干大型商墓是1989年发掘的。地面原有坟丘，墓坑东西向，椁室长8.22米，宽3.6米。出土物近千件。青铜器480多件，玉器100多件，陶器300多件。其中，青铜器最引人注目，数量之大、品类之多、造型之奇特、纹饰之精美，不仅江南同时期墓葬所未有，在全国亦属首见。

墓内所出青铜器，有的具有商代中期风格，有的又与安阳殷墟同类器相似。铜礼器有鼎、甗、鬲、罍、卣、簋、瓿、壶、豆、带把觚等，铜乐器有铙(náo 蛲)、镈(bó 博)等共计60多件。铜兵器有戈、矛、刀、钺、镞、短剑、胄等250多件。铜农具和手工工具有犁、铧、臿、铲、镰、斧、锛、凿、锥、砧、刻刀、靴形器等120多件。其中，带把觚、短剑、单翼镞、靴形器、犁、铧等，在全国商墓中前所未见。尤其是青铜犁铧的出土，把我国犁耕

的历史提早到商代。体积大的铜礼器，例如，铜甗，通高1.10米，重85公斤。方鼎，通高97厘米，重49.2公斤。体积最小的铜礼器，如双耳鬲、扁兽足方鼎等，通高仅10厘米左右。有的铜器造型奇异，如双面人面形神器、青铜卧虎扁足鼎、立鸟双尾青铜虎、虎尊、羊角兽面器等，均为罕见器物。值得注意的是，铜器组合中，没有中原常见的爵、觚、斝等酒器，表现出浓厚的地方特点。

玉器有琮、璧、玦、环、簪以及绿松石、玛瑙人物饰品，均为精雕细琢的精品。

陶器以鬲、罐为多，还有尊、豆、壶、钵等。有的带色釉，属原始瓷质。

这批文物，从器型、纹饰看，它与中原商文化相同或相近，显然与中原商文化有着密切关系，但又有着地方性特色。据推断，该墓年代约相当于中原地区商代晚期，距今约3200年。该墓规模之大，出土物之精和数量之多，堪与殷墟王室墓相比。据此，推断墓主可能是商代南方一个方国的最高统治者。

三星堆祭祀坑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县南兴镇

北。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这一地带曾出土大批玉石器，因而引起重视。1986年发掘的两个祭祀坑，出土大批珍贵文物。这批青铜器的形制风格，稍早的与中原同类商器相同，稍晚的则与长江中下游及陕南地区的晚商器接近。但在花纹上均略有不同，应是蜀地的自铸品。展示了早期蜀国的灿烂文化。

这两个坑虽不算大，但出土物却十分丰富，而且多是罕见珍品。共计800余件。

1号坑，平面呈长方竖穴式，长4.6米，宽3.5米、深1.6米。坑内出土金、铜、玉石器、骨器、陶器、象牙等300余件。还有海贝、骨渣等。

2号坑，平面呈长方竖穴式，长5.3米，宽2.3米，深1.55米。坑内出土方座大型立人像、人头像、人面像、神树、鸟、鹿。戈、罍、尊、铃、彝等铜器的439件。璋、瑗、环、戈、凿、刀、珠、管穿等玉石器约131件。

祭祀坑的年代，依地层关系，1号坑约相当于殷墟前期，2号坑稍晚。距今约3000年。

现将两坑的出土精品分别选介。

1号坑出土物:

金杖　全长1.42米,重780克。金皮包卷木芯制成。杖上平雕人头、鸟、鱼、穗等精美花纹图案。还有一穿孔铜龙头。原为金皮木芯铜龙头杖。

金面罩　高9厘米,用金皮模压而成。

铜跪坐人像　高15厘米,宽脸、方颐、高髻。

铜人面像　高6.5厘米。宽脸、大眼、尖鼻。

爬龙柱形器　通高40.5厘米。器顶有一龙用两后爪紧抓器壁两侧,尾上卷。

以上铜头像、人面像、金面罩,均为国内首见。

2号坑出土物:

铜大型立人像　通高2.62米,重180公斤。头戴高冠、粗眉大眼、鼻梭突出。嘴角下勾,方颐大耳。身着高领长衣,赤足站在方座上。

铜小型人像　通高13.3厘米。头戴平顶双角冠。高鼻梁、大嘴、身着对襟长服,右腿蹲下,左腿单膝跪坐。

人头像　最大的通高46.6厘米。高鼻

梁，嘴角下勾，云纹大耳。

人面像　均半圆形，眼球突出眼眶，鹰钩鼻，双耳极大，通高65厘米。

铜神树　高4米左右。立于三山正中，上有花果、飞禽、走兽。

三鸟三羊尊　通高41.8厘米。腹部兽面纹，以云雷纹为地。内装大量海贝。

八鸟四牛尊　通高53厘米。肩饰夔龙纹。腹上饰兽面纹。以云雷纹为地。

这批珍贵文物的出土，展示了古蜀青铜文化的水平与艺术特点。是研究古蜀文化历史等方面问题的极为重要的资料。

5 周原与丰镐遗址

西周时期的考古工作，自以当时政治中心周原、丰镐（hào 号）两地区的发现与发掘最为重要。

周原遗址

周原位于陕西关中平原西部。北倚岐山，南临渭水，东起武功，西至凤翔、宝鸡。为周之先人古公亶父由邠迁岐定居之地。周人来到周原，建都立国，都城名京，立国为周。所以，周原是周人的发祥地。公元前

12世纪周人灭商，文王武王迁都丰镐。这里仍是西周重要政治中心。至西周末年，西戎入侵，遂成废墟。为此，周原地下埋藏十分丰富的西周文物。

周原遗址横跨扶风、岐山两县北部，东西约7公里，南北约7公里。1976年在岐山凤雏村、扶风召陈村发掘两处西周大型建筑基址，以及铸铜、制陶、制骨等手工业作坊，居住址、铜器窖藏和墓葬等。出土数以百计的精美铜器，其中，近百件铸有铭文。又发现1.7万多片西周甲骨，其中约有300多片刻有文字。以及其他大量遗物。

凤雏建筑基址是一座“四合院”式的建筑群。坐落在夯土台基上。台基南北长45.2米，东西宽32.5米，面积约近1500平方米。台基高约1.3米。坐北朝南，方向北偏东10度。它的布局（由南往北）包括：影壁、左右门塾组成的门厅、中院、殿堂、过道、东西小院、后室、东西厢房等部份。每一部份建筑与院落之间，都以台阶走道相通。中院的后面为殿堂。是这组基址的主体建筑。面阔6间、进深6米。四周有回廊。殿堂北壁用土坯砌成。西厢一个房间内发现

的两个窖穴，出土大批周初卜甲。这组基址内发现两处排水管道。一处为南北走向，用陶水管套接而成。另一处为东西走向，沟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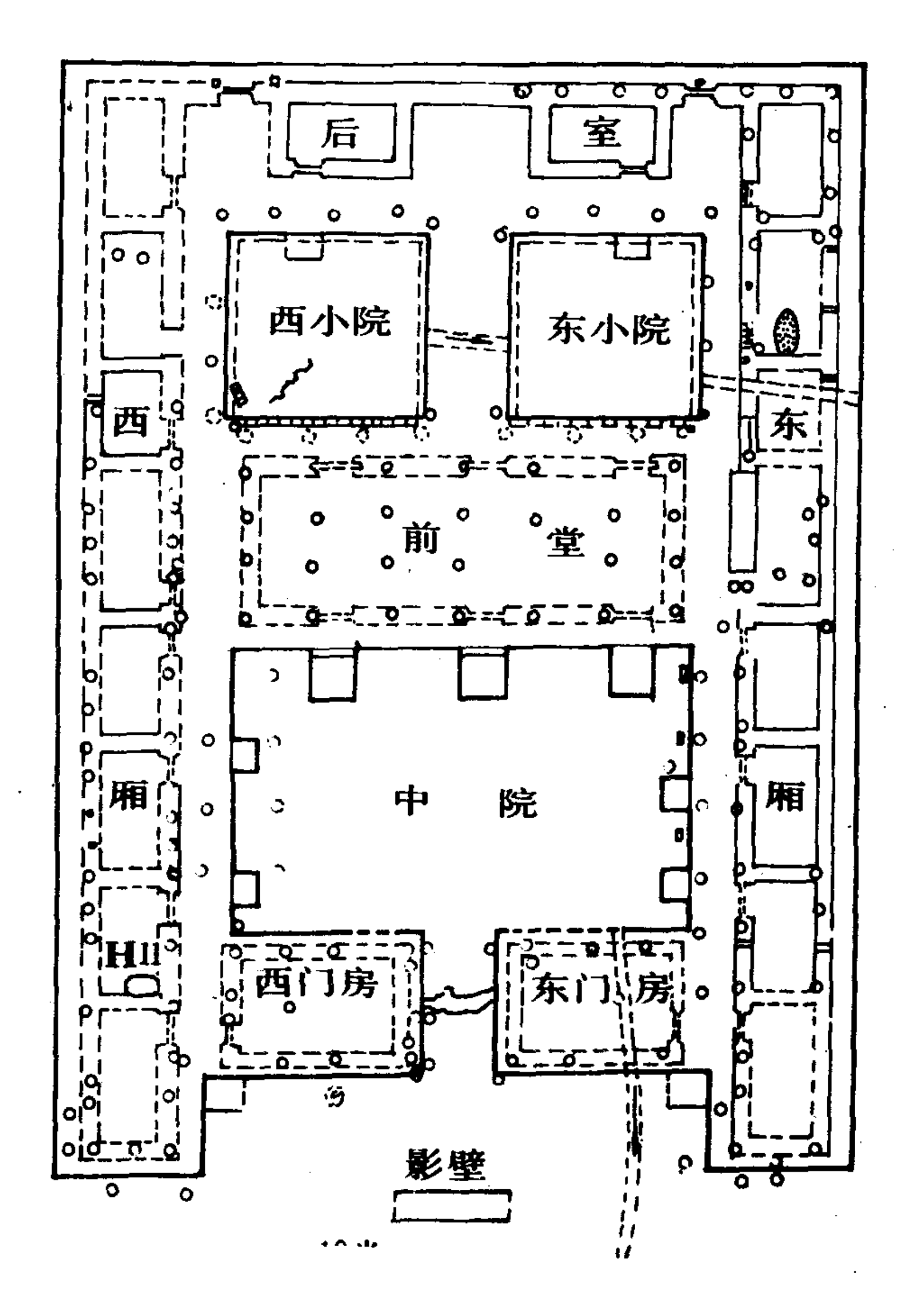


图 2　陕西岐山凤雏西周建筑基址平面图

壁和底部用大卵石砌成。上铺棚木，再填土夯实。建筑物的墙是用黄土夯筑而成。墙壁与屋内地面均用细砂、白灰、黄土混合的“三合土”涂抹。在屋内堆积物中，有芦苇、麦秸草和少量的瓦(图2)。

凤雏大型基址的年代，据碳十四测定为公元前1095±90年(未经树轮校正)。又据出土陶器，为西周中、晚期器。推测它的始建年代，当在武王灭商之前，废弃年代约在西周晚期。

召陈建筑基址，不像凤雏发现的那样自成院落。已发掘的15座，分属早晚两个时期。据推测，早期基址建于西周初年，晚期基址建于西周中期。

晚期的3号、5号、8号三座基址规模较大。其中3号基址是一座高台建筑。东西22米，南北14米。正面6间7柱，总面阔从柱中到柱中为13米。面积281平方米。正面中间两间最宽，面阔达5.6米。据柱网分析，3号基址应是“四阿屋顶”的构造。而且是瓦顶。遗址中出土大量瓦，有板瓦和筒瓦，有的筒瓦上带有半圆形瓦当。周瓦的发现，把我国建筑用瓦的历史提早到

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代。

早期基址以7号、9号两座保存较好。其中，7号基址南北残存4间，面阔8.75米。东西4间，进深11.4米。在第3间之内另有地下的火坑，当是取暖用的地炉。9号基址的四周有卵石铺成的散水。它们也是“四阿式”瓦顶建筑。

1977—1979年夏，凤雏甲组基址与扶风齐家村出土甲骨共计1.75万多片。卜甲凿方孔，卜骨凿圆孔。有字卜甲293片。扶风齐家村出土带字大龟版一块、牛肩胛骨3片。合计有字甲骨近300片。总字数600多个。有不同的单字360多个。每片甲骨上的字数，最多的30字，最少的1字。字体细小，字小如粟粒，笔道似发丝，要用5倍放大镜方能见其真貌。是我国最早的微雕作品。甲骨刻辞内容，主要是卜祭和卜征伐等。年代多属西周早期，也有早到文王的。有的提到成汤、太甲、文武丁、文武帝乙和周方伯等商周王名。以及毕公、箕子等人名。有的提到蜀、巢、密、楚等方国名。以及河、洛、镐、帛等地名。为研究西周早中期的历史、周曾隶属于商，及其与其他方国的关

系，提供了重要资料。

铜器窖藏已发现十多处，其中最重要的有：1975年岐山董家村出土的包括裘卫四器（鼎二、𣪘一、盘一）在内的37件铜器。制作年代从周穆王到宣王时期。其中30件有铭文，记西周中晚期以物换田、土地交换、林场易主、诉讼判决、赏赐策命等重要事件。《𠑇(shèng 胜)匜(yí 仪)》铭文157字，是我国最早的一篇诉讼判决书。1976年扶风庄白村发现的一处铜器窖藏坑，出土铜器103件。铸铭文的74件。其中属于微氏的，有折、丰、墙、㾪(xīng 兴)四代贵族所作器物55件。最重要的是墙盘，铭文284字。记述文、武、成、康、昭、穆和在位天子(恭王)六世周王的业绩。并记史墙家族史，最后自赞多福。

这里还应提到，陕西其他地方出土的两件史料价值特高的西周铜器。《利簋》，临潼的一处窖藏中出土。铸有铭文32字，开头即有"武征商，唯甲子朝"等语，所记征商日辰与《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一致。无疑制作于武王伐灭商纣之后不久。堪称西周第一重器。《何尊》，宝鸡贾村镇出土，

制作于周成王五年(约公元前11世纪)是西周第一件有纪年的铜器。铸有铭文122字。记述成王营造洛邑,“余其宅兹中国”。内容可与《尚书》的《洛诰》《召诰》等篇印证。“中国”这一名称,起于西周初年是可以肯定的。

丰镐遗址

西周王朝都城丰镐遗址位于陕西省长安县的沣河两岸。丰京在西,镐京在东。总面积约13平方公里。从公元前12世纪周文王建丰邑,武王作镐京,到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300多年来,丰镐一直是西周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丰镐地区的田野考古工作肇始于本世纪30年代。50年代以来持续进行重点的调查与发掘。沣西的客省庄、马王村一带发现十多座大型夯土基址和若干铜器窖藏。沣东的洛北村等地,也曾发现大型建筑残迹,其中包括数量较多的西周残瓦。从而为探寻丰镐二京遗迹提供可以寄予希望的线索。

丰镐地区发掘较多的还是西周墓葬,仅沣西张家坡一带累计发掘上千座之多。

其中近年发掘的井叔家族墓地，以周王重臣井叔的双墓道大墓为中心，布局排列有序。主次分明，规格之高在丰镐地区尚属前所未见，是考察西周高级贵族葬制的典型资料。其中，井叔墓地的几座带墓道的墓，规模大，随葬品多（墓已被盗），还残存若干精品，对确定墓主及分期上均具重要意义。井叔墓地中规模最大的157号墓，由墓室和南、北墓道组成。平面呈“中”字形，总长35.4米。墓室中央为椁室，椁室置内外两重棺，外棺髹（xiū 休）黑漆，内棺髹红漆。墓主骨骸经鉴定为40多岁的男性。墓道内放置车轮、车舆（yú 于）、辕、轴等。在157号墓的东西两侧，又有163号和161号两墓与之骈列。161号墓的骨骸鉴定为四五十岁女性。三墓均被严重盗掘。仅163号墓残存井叔钟等青铜礼器。推测这组大墓应属一代井叔及其妻室的异穴合葬墓地。出土井叔铜器的还有170号、152号等墓。这两座墓的规格低于157号墓，都只有一条墓道，分别出土井叔方彝和井叔鼎。应是年代稍晚另二代井叔之墓。

井叔墓地残存的几件铜器，都是难得

的珍品。“弄(dèng 邓)中(仲)牺尊”，高38.8，长41.4厘米。作兽形，头立双角、双耳、曲颈、四蹄足。身有双翼，头顶一虎，颌下一龙，尾部一曲龙。盖纽为一大鸟。盖周缘饰一周双身龙纹。通体饰兽面纹、夔龙纹和雷纹。器腹内及盖内有相同铭文2行6字："弄中乍宝隮(zhēng 征)彝"。井叔钟现存2件，一件通高37.5厘米。另一件略小。钟上铸："井叔采作朕文祖穆公大钟"等铭文共7行39字。井叔方彝，通高约20厘米。器底及盖内各有一行铭文："井叔作旅彝"。

在沣东花园村、普渡村一带在发掘的10多座西周墓中，以1981年发掘的15号、17号两座并列的墓所出青铜器数量较多，年代又比较明确。并且有大量的陶器和铜器共出。这对于丰镐遗址和西周文化的分期断代有新的重要帮助。

两墓出土的青铜礼器共计29件。其中15号墓出有圆鼎、方鼎、簋、尊、卣、爵各2件及觯(zhì 治)1件共13件。17号墓有圆鼎、簋、爵各2件，方鼎、甗、尊、卣、圆壶、方壶、觚、觯、盘、盉各1件，共16件。有的铜

器造型特殊，例如17号墓的一件铜盉，盖作卧伏的凤鸟状，较为罕见。两墓所出铜器除个别属西周初期外，多数属昭王前后，有的晚至西周中期。几件铜器的铭文分别记载作器者曾受到周王赏赐。两墓附近又都有车马坑（15号墓3车8马、17号墓2车4马）可见墓主的身份是相当高的。

1954年在普渡村北发掘的一座墓，所出土成组铜器多件铸“长甶（fú 扶）作尊彝”的铭文。其中铜盉的铭文，记述周穆王举行燕礼和射礼，长甶参加比射，受到褒奖的史实。记“佳三月初吉丁亥，穆王在下淢（yù 域）㕘……”同出的还有三件甬钟，是目前所知年代较早的一组编钟。

这里还应提到，斗门镇下泉村出土的“多友鼎”，通高51.5厘米，重37公斤。铸于周夷王时期。腹内壁铸铭文278字。记述多友奉派参加对戎的一次防御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史实。是陕西目前出土铭文最长的一件铜器。

丰镐地区的考古工作，已经取得许多重要的收获，大体可以确定丰镐二京的方位。但二京中心究在何处？仍有待今后的

更多考古发现。

6 北京琉璃河燕国墓地与城址

琉璃河遗址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北1.5公里。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1.5公里。1973年开始进行勘查发掘，为研究燕国早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琉璃河西周城址坐落在遗址中部的董家村一带。经发掘，北城墙全长800余米。东墙与西墙分别探出300余米。南墙及东西两面墙的南段，因破坏严重，长度不明。墙体用黄土夯筑。墙宽10米左右，墙底有浅槽。墙体分段夯筑。主城墙的下部两侧有“护坡”，城外侧有壕沟。城内已发现房基等遗迹。推定为燕国早期都城遗址。

城址东南的黄土坡村附近，是当时的墓地。历年发掘了300多座西周墓葬。大墓分别设有一、二、四条墓道。随葬成组的青铜礼器、玉石器、漆器、原始瓷器以及兵器、车马器等。并在墓中发现人殉。又有附葬的车马坑。不少铜器上的铭文提到“匽侯”(燕侯)。253号墓出土的“堇(jǐn 谨)鼎”，高62厘米。有铭文26字，记述燕侯命

堇到"宗周"(丰镐)去向太保(召公奭(shì市))奉献贡品的史实。同出的另一件铜器器主"圉(yú余)"曾参加在"成周"(洛阳)举行的典礼,受到周王和燕侯的赏赐。251号墓出土《伯矩鬲》,记述器主"伯矩"受到燕侯的赏赐;1029号墓出土的铜戈有"匽侯"二字,铜戟有"匽侯舞戈"四字,铜泡上有"匽侯舞昜"四字,都是燕侯生前的用器。这些发现表明,当地是燕国早期的贵族墓地,有的墓主也就是某代燕侯。

发掘的车马坑所埋车马数量不一。最少的埋1车2马或4马。最多的埋10辆车、42匹马。有的把马杀死后与整车埋入坑内,还有的将车拆散后埋入坑内。车轮的辐条,有的为18根,有的为24根。有的车上备有伞盖,平面为圆形,直径1.3米,有26根伞骨,自顶部向外作放射状排列。

1986年发掘的1193号大型墓,出土两件长篇铭文铜器,引起考古、史学界广泛重视。墓室为长方形土坑竖穴。方向352度。现存墓口南北长7.68米,南端宽5.45米,北端宽5.25米。墓底距地表10.25米。这是琉璃河墓地规模最大的墓,并且是唯

一有四条墓道的大墓。引人注目的是，它的四条墓道开在墓室的四角，过去其他墓地还从来没有发现这种形制的墓。由于严重盗掘，随葬器物所剩无几。但仍出土200多件。有铜礼器、工具、兵器、马器、漆器、货贝等。墓室的南半部竖立10根长矛和若干嵌有铜饰的漆盾。矛杆长4米左右，铜矛头的尖部被拆去另置。漆盾形状有多样，有的长方形，有的上部为山形脊。铜饰则有人面形、菱形和圆形。矛和盾同时出土，反映了它们在使用上的联系，是我国兵器史研究的珍贵标本。墓内仅存的三件青铜礼器中，罍和盉都有较长的铭文，两器内容相同，各43字。铭文以“王曰太保”开头，褒扬太保本人。又有“令克侯于匽”等字句，以及授民疆土方面内容。这是关于燕国立国历史的难得物证。根据两件铜器铭文的内容和该墓的规模，推测墓主身份应属王侯一级人物，必定是地位显赫的一代燕侯之墓。

这些发现，有力地证明琉璃河城址即西周时期燕国都城，为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推前到3000年前的西周初年。

西周早期以至商代的文化分布，已经

达到辽宁西部地区。1955 年喀左(原凌源)马厂沟出土的以燕侯盂为主的西周早期窖藏铜器群是一次重要发现。随着北京琉璃河燕墓发掘的进展,喀左铜器与西周早期燕的密切关系可以看得更加清楚。喀左地区出土的“伯矩”甗和“圉”簋,与琉璃河燕墓所出的“伯矩”鬲和“圉”方鼎等器为同一族组器。而琉璃河“伯矩”鬲和“圉”方鼎都记有这个族在周初与燕侯的从属关系。这是燕侯盂之后把辽宁出土铜器与西周早期燕联系起来的最好例证。喀左铜器的器型也与琉璃河铜器的器物形态相同或相近,都是以中原作风为主,又表现出某些地方性特点。

本世纪初,芦沟桥出土的“亚”盉铭文记有“㠱”(亓肌)族人“亚”受燕侯赏赐。喀左也出“㠱”器,如“婴”方鼎内底正中铸“盉侯亚矣”,“㠱”为商代一巨族,延续至周初,在燕山南北地区存在着,是为西周早期燕迅速发展的基础。

以上这些发现,把北京地区西周文化遗存与喀左铜器窖藏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有力地说明西周早期燕的势力已进抵辽西

地区大凌河流域。同时，证实商周王朝的北部疆域已达到长城以北。

7 曾侯乙墓、中山王墓与秦公大墓

东周时期的墓葬发掘很多，总计已达6000座以上。这些墓葬反映了东周时代各地的丧葬礼俗的特点及其演变情况，也为研究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变化提供了丰富资料。然而，在东周数千座墓葬中，随葬品丰富而又十分精美的大墓，应首推曾侯乙、中山王两座大墓。秦公大墓则是已发掘的东周墓中最大的一座。

曾侯乙墓

曾侯乙墓位于湖北省随州市西郊擂鼓墩，是战国早期的一座特大墓葬。1978年发掘。该墓规模巨大。出土物共万余件，不少是前所未见的珍品。其数量之多、制作之精，文字资料之丰富，实属罕见。在一些铜器上铸有“曾侯乙”之类铭文，说明曾侯乙就是这座墓的主人。又据铜镈铭文：“隹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酓(熊)章乍曾侯乙宗彝……”获知曾侯乙下葬年代为楚

惠王熊章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或稍后。

该墓为岩坑竖穴木椁墓。平面多边形。方向正南北,东西21米,南北16.5米,深13米左右。木椁置于墓底,四周有椁顶填木炭逾6万公斤。木椁高3.1—3.5米,由171根长条方木垒成,共用木料380立方米。椁室分东、北、中、西四室。主棺置于东室,分内外两层:外棺长3.2米,宽2.1米,高2.19米。是在铜质的巨大框架上镶嵌木板构成,总重量达7吨多,棺外先涂黑漆再绘以朱、金黄色花纹。内棺长2.49米,宽1.27米,高1.32米,用大型厚木板制成。内涂朱漆,外以朱漆为地,绘以黄黑色彩花纹。一端绘窗户,两侧绘门,门两旁绘神兽武士。墓主骨骸经鉴定为男性,年45岁左右,原本用多层丝织物包裹,周围置有玉、骨、角器及金器等物300多件。墓内殉葬人(21具)均为女性,年龄在13—25岁之间,可能是墓主的妃嫔乐舞之人。

出土物达万余件,包括礼乐兵车在内的各种青铜器件,总重量达10吨左右,是历年来出土铜器最多的一墓。中室的西、南

两侧陈放编钟，北侧置编磬，瑟笙等乐器则列于钟磬之间。北室内，摆满兵器和车马器，有成捆的箭镞、长杆兵器及甲胄，车軎(wèi 卫)、马镳(biāo 标)，车华盖等，另有一对各重 300 多公斤的大铜缶和竹简等。

铜礼器中，有九鼎八簋、成对的簠(fǔ 甫)、豆、壶、鉴、缶、及 鬲、甗、盘、匜(yí 疑)等 140 余件。大多是浑铸、分铸和二者结合焊接等方法铸造。有的用浮雕、镂空、错嵌等技术制成。令人惊异的是一件尊盘，口沿上细腻多层的镂空附件，系用失蜡法铸造的。更引人注目的是大批乐器：编钟、编磬、鼓、瑟、琴、笙、排 箫、篪(chí 池)8 种，共 124 件。管弦乐器与打击乐器俱全。在打击乐器中，以整套编钟最为珍贵。竹管排箫、铜座建鼓、十弦琴、五弦琴均为首次发现。篪在已出同类乐器中是年代最早的。

曾侯乙编钟包括纽钟 19 件、甬钟 45 件及外加的一件镈钟，共计 65 件。最大的一件通高 153.4 厘米，重 203.4 公斤，最小的一件通高 20.4 厘米，重 2.4 公斤。整套编钟总重量达 2500 公斤。出土时，全部编钟依大小和音高为序组成 8 组，悬挂在铜

木结构的曲尺形三层钟架上。钟架全长10米以上，通高2.73米。中下层横梁由三个佩剑青铜武士分别用手、头顶托着。编钟，经测音，每个钟都能敲出两个乐音，整套音阶结构与现今国际通用C大调七声音阶属同一音列，总音域跨至5个八度，其中心音域12个半音齐备，可以“旋宫转调”，至今仍能演奏多种曲调。编钟上有篆体铭文，多为错金文字，共有2800余字。除“曾侯乙乍(作)時(持)”外，其余均是音乐方面的。可分标音与乐律两大类。确为我国古代音乐史上的珍宝。

出土竹简240多枚，简长72—75厘米，宽1厘米。简文墨书篆体，总字数6600字。内容是丧仪用的车马兵甲纪录，是一份珍贵的文字资料。

出土的漆木箱，盖上绘一大“斗”字，周围是二十八宿名称和青龙白虎图像。这在现存二十八宿名称资料里，是年代最早的一种。可证我国是在世界史上最早创立二十八宿体系的国家之一。

中山王墓

1974—1978年河北省平山县城北的

灵山下，发现中山国晚期都城灵寿故址。并发掘两座公元前4世纪末的王陵。1号墓在灵寿城址以西的西灵山下，有尚未发掘的2号墓在其东侧并列。6号墓在城内西北部东灵山下，有3、4、5号三墓在其西侧并列。两座大墓的上部都有夯筑封土和享堂基地。1号墓保存较好，封土东西宽92米，南北长110米，高约15米，呈三级台阶状。可复原为一座周绕回廊、上盖瓦顶的台榭式建筑。6号墓主未能判明。1号墓则因所出铜豆铭文可确认中山王嚳(cuò 错)之墓。两墓的墓室结构基本一致，平面为"中"字形，由方形椁室和南北两条墓道组成。1号墓全长110米，椁室南北14.9米，东西13.5米，深8.2米。石砌椁室，厚约2米。6号墓的规模略小。两墓的附近，又都有陪葬墓、车马坑、船坑、杂殉坑。

两墓出土随葬物共达19000余件。前所未见的"山"字形巨大铜器，大约是悬挂在旗顶端，作为王权的象征物。1号墓所出5件，均高1.19米，6号墓出6件，均高1.43米。1号墓出土器物较多，青铜礼器有九鼎四簋和鬲、豆、壶等。乐器有编钟14

件、编磬13件。又有帐钩、漆器和陶器等。尤为难得的是其中的铁足大鼎、方壶、圆壶三器,器表镌刻铭文1101字,在战国铜器中尚属首见。它不仅表明墓主为中山王譽,而且证明中山王世系及有关史实,是研究中山国历史的重要资料。由于铭文中提到公元前316年中山国的相邦率师参加伐燕和燕王哙(kuài 快)让王位于燕相子之的事,中山国又亡于公元前301年,因而该墓年代可推断为公元前310年前后。

随葬器物中的艺术珍品有:银首人俑铜灯,高66.4厘米,器身为一穿长袍的男子,左手握蟠蛇联接的两层灯盘,右手高举蟠蛇连接的另一灯盘(除此器出自6号墓外,其余均出于1号墓)。金银镶嵌龙凤形铜方案,器足为四只卧伏式小鹿承一圆盘,圆盘上蟠绕着4龙4凤,龙顶又各有斗栱承方案,制作十分精巧。十五连盏铜灯,高84.5厘米,形似大树,树上有群猴攀援,树下有二人仰面挑逗。另有几件错金银动物形器座,包括银镶嵌双翼神兽和牛、犀等形象,其中以虎噬(shì 是)鹿的形象最为生动。

更难得的是1号墓出土的“中山王陵兆域图”铜版，现长94厘米、宽48厘米。用金银镶错出中山王陵园的平面规划图。此图是目前最早的建筑规划设计图。确是我国考古学和建筑史上的一项重要收获。

秦公大墓

东周时期的秦公陵墓多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城之南秦雍城遗址南面的三畤(zhì志)原上。现已发现十几座陵园，每个陵园都有一、两座地面残存“享堂”遗迹的“中”字形大墓，以及陪葬的车马坑等。整个陵区和每个陵园又都有护陵壕沟环绕。一号陵园的1号大墓，是其中规模最大、面积最大的“中”字形大墓，也是目前所知东周列国最大的墓。该墓全长300米。墓室东西长59.4米，南北宽38.45米。东墓道长156.1米，东端宽8.7米。西端宽(与墓室连接的一端)19.1米；西墓道长84.5米，西端宽6.4米，东端宽(与墓室连接的一端)14.3米，墓深24米。总面积达5334平方米。

墓室内有三层台阶，台阶环绕墓壁，阶宽2—6米。第一层与第二层相距5.3米，第二层与第三层相距7.6米。第三层台阶

中部为墓室，高约 4.2 米。1 号大墓的发掘工作，历时 11 个年头方告结束。

该墓虽经多次盗掘，仍出土一批金器、铜器、铁器、石磬、漆器、丝织品、陶器、玉器等遗物达 3000 余件。在木构椁室的周围及上部填土中，发现 180 多具人殉、人牲的箱匣。这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发现人殉和人牲最多的大墓。

墓中出土的石磬残块 28 件，残存的铭文有："天子匽喜，龚趄(huán 桓)是嗣，高阳有灵，四方以鼏(mì 宓)"。据此，推测墓主人应是继共公、桓公之后的景公(公元前 576—前 537 年)。高阳氏即黄帝之孙帝颛(zhuān 专)顼(xū 须)。秦人自称高阳氏之苗裔，本属华夏族。磬铭表明这一历史情况。为秦国史研究提供一条重要资料。

三　秦汉及其以后时期

1 秦咸阳宫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

1959年开始勘察、发掘的秦都咸阳遗址，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以东15公里处。是秦国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时期的政治中心。现已发掘一组高台宫观基址，坐落在秦的上原谷道（今名牛羊沟）的东西两侧。西侧为第1、3号基址，东侧第2号基址。据研究，当时由跨越谷道的飞阁回廊将这组对峙的宫观连成一体。形成富有艺术魅力的台榭复合体。

1号基址的平面呈“凹”字形。东西177米，南北64米，台高6米。现只清理了西半部。基址分上下两层建筑。上层正中为主殿，周围及下层，分别为卧室、盥（guàn 灌）洗、沐浴等室。底层为回廊。

2号基址的平面为刀把形，西阔东窄，东西127米，南北32.8—45.5米。主殿在最阔的西半部，呈方形。东西198米，南北

195米。东半部残存4室，其中两室可知是地下盥洗室。基址周围有回廊和排水设施。

3号基址在1号基址的西南方，其间有夯土连接。平面长方形，东西123米，南北60米，高台残高1.5米。主殿已无遗迹。现存周围11室，其中最大面积为115.2平方米。基址东侧有一条南北向的画廊，南北32.4米，东西宽5米，计9间。东西两壁绘制壁画。题材为秦王出行车马仪仗之属。其中有车马、人物、花木、建筑等形象。秦宫壁画，为我国目前最早的宫殿壁画资料。

秦始皇陵兵马俑坑

秦始皇（公元前259—前210年）陵，在陕西省临潼县城东5公里处骊山北麓平原上。北临渭河，像一座耸立的山丘。经考古工作者长期普查钻探，现已查明，陵园规模之宏伟，地下埋藏之丰富，真可说亘古所无。

陵墓周围有内外两重城垣，均呈南北向的长方形。内城南北长1355米，东西宽580米，周长3870米。内城中部有一条隔墙把内城分为南北二部。南部是陵的封土区，北部是地面宫殿建筑区。外城南北长

2173米，东西974米，周长6294米。陵园东边有始皇诸公子、公主的陪葬墓和埋置陶俑、陶马、活马的从葬坑群。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兵马俑坑。

兵马俑坑在陵园东1公里处。1974年发掘。一组四坑，呈南北两行排列。1号坑在南，坑体东西长210米，宽62米，面积14260平方米。2号坑在1号坑的东北，东西124米，宽98米，面积约6000平方米。3号坑在2号坑之西，面积为520平方米。4号坑是个空坑。

已发掘部分，共出土武士俑800多件。木质战车18辆，陶马100多匹，青铜兵器、车马器共计9000余件。如按兵马俑排列形式复原，这三个坑的武士俑可能原有7000个。驷马战车100辆，战马100多匹。坑内兵马俑排列方向全部面向东方。据俑群排列现状，暂可推测，这是模拟送葬军阵的仪仗俑群。

陶俑身材高大，高的达2米，矮的1.75米。一般在1.8米左右。种类也多，骑兵俑、车兵俑、步兵俑。其中，步兵俑按地位又可分为将军俑、军吏俑、铠甲步兵俑和轻

装步兵俑。车马俑按职务可分为甲士俑和御手俑。陶俑形态各异，神情逼真，展现了我国秦代高超的雕塑艺术。

骑兵俑出于 2 号坑，一律戴小圆帽，帽两侧有扣带结在颔下。上衣和铠甲较短，腰系带，下穿紧口裤，足蹬短靴，身高 1.8 米以上。

兵马俑庞大的军阵体系，形象的展现出秦军的兵种组成，编列和武器装具情况。显示了秦王朝兵强马壮、威震天下的军事力量。

1980 年发掘的两辆铜车马，其大小为真车真马的 1／2。完全模拟实物制成，也是前所未有的考古发现。

1 号车为立车，即立乘之前导车。通长 2.25 米，高 1.52 米。单辕双轭，套驾四马。即两骖（cān 参）两服。车舆呈横长方形。车上置一圆形铜伞。伞下立一御马官俑，双手执辔（pèi 沛），舆内有铜方壶、弓、弩、镞、盾等。四匹铜马均饰金银络头。鞍具上有编号文字 29 处，共 49 字，均小篆体。

2 号车为安车，即坐乘之轿形车。全长 3.28 米，高 1.04 米。车厢分前、后两室，前

室为驾驶室，内有一跽坐的御官俑、腰际佩剑、执辔前视。后室为乘主坐席。车厢上有椭圆形车盖。车亦单辕双轮。前驾四匹铜马。

2 汉长安城与未央宫遗址

汉长安城遗址在陕西省西安市西北郊。为西汉都城遗址。汉高祖刘邦七年（公元前200年）建都长安。惠帝元年至五年（公元前194—前190年）筑造城墙。1956年开始勘察与发掘。

城址平面近方形，旧称"斗城"，东城墙长约6000米，南墙长约7600米，西墙长约4900米。北墙长约7200米。总长相当于汉里六十二里。总面积为36平方公里。墙基宽12—16米，墙外侧绕以宽约8米、深约3米的城壕。

城门与街道：城四面各有3座门。东墙（北起）有宣平门、清明门、霸城门；南墙有覆盎门、安门、西安门；西墙有章城门、直城门、雍门；北墙有横门、厨城门、洛城门。通过宣平门、霸城门、西安门和直城门的发掘，判明每座城门有3个门道。直城门中间

门道宽 7.7 米，两侧门道为 8.1 米，门道间距 4.2 米。门两侧有石础，原建有木构门楼。街道笔直，主要街道 8 条，各宽约 45 米（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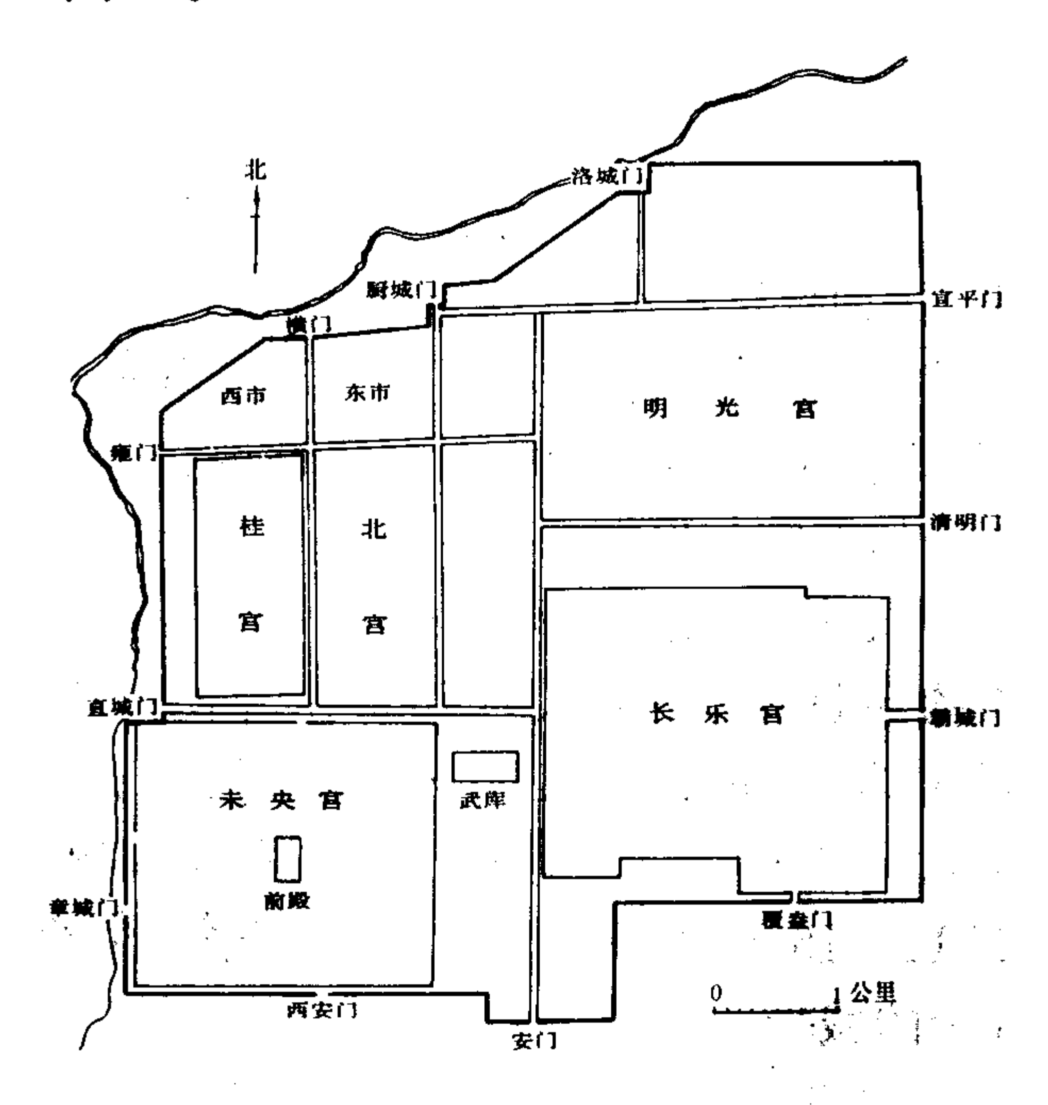


图 3 汉长安城平面示意图

城内重要的建筑群遗址，有长乐宫、未央宫、武库、东市、西市等。长乐宫又称东宫，汉初为皇帝视朝之处，惠帝改为太后寝宫，位于城东南角，平面近方形，四周有宫

墙，墙基宽20米，周长1万米以上。未央宫又称西宫，为皇帝朝会之处。位于城西南角，平面方形，四面有宫墙，东西长2250米，南北宽2150米。其中前殿基址，南北350米，东西200米。北部高台高达15米。

1986年在未央宫范围内发掘的一处官署遗址，出土进贡物品的刻字骨签数万片。骨签均为动物骨头（主要是牛骨）制作。长5.8—7.2厘米，宽2.1—3.2厘米，厚0.5厘米。其内容可分两类：(1)一行字(6—7字)，刻有物品名称、规格、编号；(2)2—4行字(10—40字不等)，刻有纪年、工官名称、有关官吏和工匠人名。它的出土，反映了当时各地手工业生产的发展状况，不同年代的进贡物在数量上和品种上的变化，以及各地基层官制的设置情况。这是研究西汉社会史的一批珍贵资料。

武库是西汉的中央兵器库，遗址位于长乐宫与未央宫之间。平面长方形，四周有围墙。东西880米，南北320米。内有库房基址7处。出土大批武器，有铁刀、剑、矛、戟(ǐ几)、镞、铠甲。铜戈、镞、剑格等。其中以铁兵器为主。各类武器比较集中，反映当

时各库房是按武器类型分类存放的。

城南郊礼制建筑群遗址，以明堂辟雍和王莽九庙遗址规模大，保存较完整。

明堂、辟雍，为汉平帝元始年间，王莽执政时所建。遗址在长安城南正中的安门外大道东侧。当时合明堂辟雍为一，平面呈“外圆内方”。中间一座方形（南北 205 米、东西 206 米）夯土台。在这方形土台正中的圆形（直径 62 米）夯土面之上，再建平面呈“亞”字形的主体建筑。中心台的四边有四个厅堂。整个中心建筑的四周又有正方形围墙，每边 235 米。四面各开一门。围墙四隅建有曲尺形配房。围墙外再绕以圆形圜水沟。

王莽九庙，为王莽建立新朝后所建之宗庙。遗址在汉长安城南安门外大道西侧，与明堂辟雍对应。这组建筑群，由 12 座建筑组成。1—11 号基址为一组，外有方形围墙，每边 1400 米。12 号在它的南墙外正中。这 12 座建筑形制基本相同。1—11 号建筑，可分三排。北排（1—4 号）与南排（8—11 号）方位一致，南北对应。中排（5—7 号）错落在南、北排之间。每座建筑

四周都有围墙。其中心主体建筑，平面“亞”字形。这些建筑，除外边无水沟环绕外，其平面布局与明堂辟雍相似。在九庙遗址中的石础上，有“始建国”年号，因此，推定为“王莽九庙”遗址。

3 长沙马王堆汉墓与临沂银雀山汉墓

马王堆西汉墓与银雀山西汉墓的发掘，是我国考古工作上的重大收获。其中，马王堆墓中出的帛书与银雀山墓中出的汉简，是我国考古学上古代典籍的重大发现。

长沙马王堆西汉墓

马王堆汉墓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东郊。1972—1974 年发掘了 1、2、3 号墓。这三座墓全由坟丘、墓道、墓坑和墓室组成。墓内棺椁用巨大木板制成。上下四周填塞木炭和白膏泥。1 号墓棺椁规模最大。椁室长 6.73 米、宽 4.9 米、高 2.8 米。共用木料 52 立方米。内置四层套棺。棺盖板上覆盖帛画一幅。木椁系榫扣结构，无金属销钉、无锯刨痕迹。全部工艺由斧、锛、凿手工完成。四周和上顶全铺塞白膏泥和木炭，木炭总

重量达万余斤。墓主为女性，年约50岁。全身裹殓（liàn 练）各式衣着、衾（qīn 亲）被及丝麻织物18层，连贴身衣共20层。经解剖，尸体不仅外形完整，内脏器官也是完整的。主要病变尚可确认。这具“西汉女尸”成为埃及木乃伊之外又一世界奇迹。在医学上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1、3号墓内覆盖在棺盖上的帛画，都是用单层绢作地。呈“丁”形。全长2米许。两幅构图大致相似。上部绘日、月、升龙、扶桑树、蛇身神人图形。象征着天国境界。下段绘蛟龙穿壁图景，墓主出行宴饯场面，是“引魂升天”之意。其不同处在于：1号墓主为女性，画一女子在弯月下腾空飞翔；3号墓主为男性，画一上身裸露男子在飞翔。这种帛画本名，应是竹简中的“非衣”（“非”，汉时训作“飞”、“非衣”即“飞衣”。旨在祝愿死者魂飞升天）（图4）。

墓中随葬物：有漆器、纺织品、陶器、竹木器、木俑、乐器、农畜产品、食品瓜果、中草药、竹简、印章等达3000多件。还有12万多字的帛书。丝织品中罕见珍品：印花敷彩纱。将涂料印花与手工彩绘相结合，工艺



图 4 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帛画

水平很高。素纱禅衣，长128厘米，重49克，平纹织物，轻薄透明犹如蝉翼。经研究，其质量还高于现代乔其纱。绒圈锦，一种特殊织锦，以多色经丝和单色纬丝交织而成。带有立体感。是迄今最早绒织物。

1、3号墓中出土多种乐器：琴、瑟、竽、箫、竽律，钟、磬、筑八种。其中一套有：汉初律名的竹质十二音律管，是我国音乐史上的重要发现。

尤其是3号墓中出土大批帛书，在考古发现中实属罕见。帛书质地为丝织细绢。书写的字体有隶书、篆书与草篆。其内容涉及古代哲学、历史、科技和医学等方面。经整理，共有28种书籍，计12万多字。除《周易》、《老子》有今本传世外，绝大多数是古佚书。诸子类有《老子》、《黄帝四经》。六艺类有《周易》、《战国纵横家书》。方术类有《五十二病方》，是我国已发现最早的一部古医方书。《病方》，涉及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等方面。《药方》，提到108种病名。关于疾病外治法，除外敷法外，还有药浴、薰治、熨砭灸、按摩、角（火罐的早期形式）等治法。《导引图》是我国最早把呼吸运动

与躯体结合起来的体育疗法。今之“气功疗法”，就从它演进而来。数术类有《五星占》，保存了我国现存最早的关于五星运动的记录。《天文气象杂占》，保存了我国最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彗星形状图录。

出土古地图两幅：(1)《长沙国南部地形图》，经复原，长宽各96厘米、正方形。所绘范围为今湖南省南部的潇水流域及邻近地区。比例在1/17万至1/19万之间。(2)《驻军图》，经复原，长98、宽78厘米。所绘范围为今湖南省最南面江华县的沱江流域。比例在1/8万至1/10万之间。近年来　，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秦王政(秦始皇)八年(公元前239年)木版地图和西汉早期纸地图。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迄今最早以实测为基础的四幅古地图。表明我国古代测量数学和测量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银雀山西汉墓

银雀山西汉墓位于山东省临沂县城南银雀山。1972年发掘1、2号墓。这两座墓均为长方形竖穴，一棺一椁。椁室分成棺室和边箱两部份。随葬品大部分放在边箱内。

1号墓出土半两钱、三铢钱(1枚),漆耳杯2件,杯底刻“司马”二字。2号墓出土的陶罐肩部刻有“召氏十斗”四字。而二墓出土数千片珍贵古籍的竹简,这在考古史上是一次重大发现。

1号墓出土竹简4942枚。整简长27.6厘米,每枚字数多少不一,多的达40余字。经整理,这批竹简大部分是兵书。《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liáo辽)子》、《管子》、《晏子》、《墨子》等周秦古籍。

《孙子兵法》,简书300余枚。十三篇都有文字保存。证实《孙子兵法》十三篇确系孙武原著。还有《吴问》(吴王与孙子关于军事答问)、《黄帝伐赤帝》等五篇佚文,很有研究价值。《孙子兵法》是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军事学名著,堪称“兵学圣典”。

《孙膑兵法》440余枚,11000字以上。已确定为《孙膑兵法》的有十五篇,它与《孙子兵法》十三篇有所不同。是祖述《孙子兵法》思想而有所发展。

《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竹简同时出土。这是我国,也是世界军事史上一件大事。它使长期以来关于这两部书的一些疑

案得以澄清解决。这又是我国学术史上一件大事。

《六韬》、《尉缭子》、《晏子春秋》。过去曾被认为是伪书。简本的出土，证实这几部书在西汉前期已广泛流传，确系先秦古书。这对宋代以来的伪书说作了否定，从而恢复了这些书的历史地位。

2 号墓出土《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竹简 32 枚。每简长 69 厘米。是西汉实用日历，也是迄今所知的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它的出土，使我们得知西汉太初以前历谱格式。证实太初以前使用的是“颛顼（zhuān xū 专须）历”（以十月为岁首）。可以校正以往推算的年代的差误。对考订历史年代，具有重要意义。

4 满城汉墓与南越王墓

满城汉墓与南越王墓，墓室凿于山岩之中，都是“凿山为陵”的大型崖墓。工程艰巨，规模宏大，浑如地下宫殿。

满城汉墓

满城汉墓位于河北省满城县陵山上。1、2 号两座汉墓，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

其妻窦绾(wǎn 玩)之墓。1号(刘胜)墓全长52米,最宽处37米,最高近7米。2号(窦绾)墓全长49.7米,宽65米,高7.9米。两墓的形制、结构大体相同。全墓可分为墓道、南、北耳室、中室、后室等部分。墓门向东。

墓中最特殊的是镶玉漆棺。外镶玉璧,内嵌玉版成长方形盒状。棺外壁镶玉璧26块,棺内壁镶玉版。棺盖底两侧及前后两端共镶玉192块。

墓中最重要的发现是“金缕玉衣”。“玉衣”的外观与人的形象一样。可分为头部、手套、上衣、裤筒和鞋五部分。由玉片组成,以金丝编缀,故称“金缕玉衣”。经修复:刘胜“玉衣”,全长1.88米,共用玉片2498块,金丝1100克。窦绾“玉衣”,全长1.72米。共用玉片2160块,金丝700克。这在汉代考古中第一次根据出土情况完整复原的两件“玉衣”。从“玉衣”制作上,反映出西汉工艺技术的高度水平。

两墓随葬品有铜器、金银器、铁器、玉石器、料器、陶器、漆器和丝织品,共计4200多件。

铜器制作精细，造型优美。例如：错金博山炉，通高 26 厘米，通体用黄金错成花纹。炉座透雕龙纹，炉上部和盖上铸出猎人狩猎于群山之中。朱雀灯，作朱雀展翅欲飞状，所衔环形灯盘分成三格。可同时点燃三支蜡烛。铜漏壶，高 22.5 厘米。刻箭上原有时辰标记(惜已损坏)，可称之为“西汉铜时计”。难得的是西汉度星衡器。“三钩”铁权，测出西汉一斤为 249.9 克。此权纽略有损缺。西汉一斤应合今 250 克。错金铁尺，有错金小点，以表示尺寸，全尺分为 10 寸。经实测，尺长合今 23.2 厘米。这种刻度汉尺，在我国是首次发现。最难得的是从 2 号墓中出土的“长信宫”灯(铭文中有“长信”字样，故名)，作宫女双手执灯的形象。灯可拆卸，灯盘可转动，灯罩可开合。可随意调整灯光亮度与照射角度。宫女头部也可拆卸，体内中空，右臂与烟道相通，蜡烛燃烧时的烟灰可通过烟道容纳于体内，以保持室内清洁。宫灯的设计科学合理，人物的造型又形象逼真。是一件罕见珍品。

南越王墓

南越王墓，是西汉南越国第二代王陵

墓。位于广州市区北部象岗山。墓室全用砂岩大石板砌筑，由前室、东西耳室、主室、东、西侧室和后藏室七部分组成。全长10.85米，宽12.5米。墓道在南，现长10.3米，宽约2.6米。髹漆棺椁已朽。

墓内的东、西侧室、前室、东耳室和墓道中，共有殉葬人10多具。应是墓主的姬妾侍从或杂役。

墓主身著“玉衣”。这件“玉衣”的手足头部玉片用丝缕编缀，其它部位玉片系粘贴在麻布片上，再用素绢覆盖，可称为“丝缕玉衣”。在“玉衣”两侧放置圆形透雕玉饰。腰间两侧佩带铁剑10把。剑长1.20米。胸前戴玉佩饰和金、银、玉、铜、玻璃等质珠串。“玉衣”上下铺玉璧，璧下有盛满珍珠漆盒，盒旁有角形玉杯。足端有仿玉陶璧130多件。陶璧之中有一银盒上刻“私官”铭文。墓主身上发现印章9枚(金印2枚、玉印5枚、绿松石印2枚)。其中，龙钮金印“文帝行玺”、玉印“赵眜”。据此，认定墓主系僭(jiàn 渐)称“文帝”的第二代南越王赵眜(《史记》、《汉书》中，“眜”讹为“胡”)。

随葬物达千余件。其中，金印2枚，引

人注目。一枚方形龙钮金印，每边长 3.1 厘米，重 148.5 克。印文："文帝行玺"。另一枚，印文："泰子"二字。"帝玺"是目前最大的一颗西汉金印。浅蓝色透明玻璃，长 9.5、宽 4.5 厘米。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块平板玻璃。在铜镜中，漆绘人物画像镜，有一件直径 41.5 厘米，也应是目前最大的汉圆镜。带托镜，直径 50 厘米，用粘合剂把镜面套入镜托凹槽中，背面镶嵌绿松石。三环钮镜，这种镜是首次发现。"山"字镜，也是少见的器物。还出土六博漆盘和六博子。漆盘有镶铜框的和镶铜贴金花的两种。六博子有象牙、青玉和水晶的三种。长方形，每套 6 颗。是我国古代一种棋子。犀角形青玉杯，长 18.4 厘米。青白色硬玉雕成。外壁纹饰，底为透雕卷云纹，中为浮雕云雷纹，口沿为浅雕。制作精细，造型优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还有药石：辰砂、铅块、紫水晶、硫磺、孔雀石等。药具：铜杵、铁杵、铜臼。这在汉墓中并不多见。再有铜镜一套 8 件，其中最大的一件，高 48 厘米，柄长 15.5 厘米。均有"文帝九年乐府工造"铭文。

5 汉魏洛阳故城与灵台、永宁寺等遗址

汉魏洛阳故城在今洛阳市东约15公里。为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都城遗址。1954年开始调查，1962年以来勘探与发掘。

城址大体作南北长方形。经实测，西城墙残长4290米，墙宽约20米。北墙全长约3700米，宽25—30米。东墙残长3895米，宽约14米，南墙因洛河北移被毁，其长度以东、西垣的间距计算约2460米，城周长14345米。

城垣的西、北、东三面，共探出城门10座。西垣5座，北垣2座，东垣3座。据文献记载，汉魏晋时有12座门，北魏时有13座门。

洛阳城西北角，曹魏时增筑金墉城。经勘察，此城由南北毗连的三座小城组成。设门道相通。平面呈“目”字形。南北长1048米，东西约255米。墙宽12—13米，城门8座：北城，西墙、南墙各1门。中城，西墙2门。南城，四面各1门。均为1个门洞。该

城北依邙山，据地势制高点，可俯瞰洛阳全城。实际上是座军事性城堡。

在大城及金墉城的城垣外侧都附设城垛。这是迄今所见古城中最早的城垛实物，也是我国城制上的一个创举。

大城内探出北魏宫城，南北长1398米，东西宽660米。南墙开1门，西墙2门，东墙1门。南门即宫城正门。门洞缺口宽46米。东西横街4条，南北纵街4条。其中，贯通宫城正南门——阊阖门至建春门的横街，全长2510米，宽35—51米。是横穿宫城的主干大道。还有北从宫城南门起，向南直通宣扬门的铜驼街，是全城的南北中轴线。残长1650米，宽40—42米。街道两侧有大面积夯土台基。应是《洛阳伽蓝记》中的司徒府、大尉府、太庙等遗迹。

城南的重要遗迹有刑徒墓、灵台、太学和城内的永宁寺等。

刑徒墓地，发掘了522座墓。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长宽仅能容身，每坑埋1人，绝大多数是男性，女性只占4%左右。有棺，有的遗骸上可看出骨折或病变痕迹。出土刑徒砖820余块，是用残砖刻铭的。铭刻记

录了刑徒的部属、狱所、名称、刑名、姓名和死亡日期等项目。这些刑徒都属于将作大匠的左校或右校管理。死后立专门登记的簿册。铭砖中刻刑徒死亡日期的共有229块。始自永元十五年(公元103年)四月三日,终于延光四年(公元125年)十月二十二日。这些刑徒绝大多数来自中原和长江中下游征调到洛阳服役的劳动人民。生前过着奴隶般生活,死后又如此凄惨。

灵台,是东汉观察天象的专门机构。建于中元元年(公元56年),北魏时废弃。遗址位于城南平昌门外。东西220米,南北200米。经发掘,东、西两侧有墙基,遗址中心是一座方形夯土台基。底部长宽各50米。台基上下两层平台。下层平台环建回廊,上层平台每面各有5间建筑。上、下层坡道相通。中心台顶平面略呈椭圆形。南北11.7米,东西8.5米。是当时观察天象之所。东汉著名天文学家张衡曾任灵台台丞(即天文台长),并在这里设计制造地动仪,写出《灵宪》等天文著作。灵台是迄今我国最早的一座天文观测台遗址。

太学,创建于东汉建武五年(公元29

年)，是我国最早的大学。遗址位于辟雍东北。分为东、西两部分。西部是一组长方形夯土建筑群，东西 104 米，南北 90 米。东部为一组密集成排的夯筑房基。南北 220 米，东西 150 米。四周夯筑围墙。汉灵帝熹平四年(公元 175 年)立石经于太学，通称“熹平石经”。魏文帝正始二年(公元 241 年)又新立石经，通称“正始石经”。这是儒家经典正本。宋代以来，时有石经残石出土，近年又有新的发现。

永宁寺，建于北魏熙平元年(公元 516 年)，是洛阳城中最大的一座寺院。寺址位于宫城南门——阊阖门基址西南约 1 公里。平面呈方形。四周夯筑围墙。南北 305 米，东西 215 米。中心为方形塔基。《水经注·谷水》说，此寺“作九层浮图”。塔高“四十九丈”(西晋一尺合今 24.2 厘米)。《洛阳伽蓝记》说，“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师百里已遥见之”。今塔基残高 8 米左右。上有五圈(124 个)方形柱础。正中有一座土坯垒砌方台，长宽均 20 米。在其东、南、西三面壁上各有五座弧形壁龛，供奉泥塑佛像。公元 534 年，寺塔毁于火。

6 邺城遗址与磁县湾漳北朝大墓

邺城遗址

邺城遗址在河北省临漳县境内，现今漳河横贯其间，可分为北邺城与南邺城。曹魏、后赵、冉魏、前燕建都于北邺城。东魏、北齐建都于南邺城。两城废弃于北周大象二年（公元580年），建都历时长达370余年。

邺城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中外学者十分关注。1935 年首次调查。1983 年开始勘查与发掘。对北邺城与南邺城的形制、平面布局和城墙、城门、城壕、街道、建筑基址有了基本了解。北邺城的布局，标志着中国城市发展史的一个新阶段。南邺城的对称布局对隋唐长安城的规划，产生了一定影响。

北邺城，经勘探，城址东西 2400 米，南北 1700 米。实际范围小于《水经注》记载，“东西七里，南北五里”的范围。南城墙在今漳河北岸，墙基宽 16.35 米。今起河堤作用。东墙探出部分长 1300 米，宽 15—18 米。并发现一座门址，应是建春门门址。北

城墙发现一座门址，门道宽 20 米，应是广德门门址。南墙三座门址自西而东为凤阳门、中阳门、广阳门。

北邺城的平面布局特点是：(1)都城中轴线的确立。城址正南门——中阳门及门内南北干道与宫殿区衔接，形成北邺城的中轴线。(2)北邺城金明门至建春门这条唯一的东西大道将城址分为南、北两区，北区大于南区。北区集中了宫城、官署等。南区主要为居民区。(3)北邺城首次把一般民居以里坊形式纳入都市规划，形成整齐的棋盘格式街道。

北邺城街道已探出 6 条。从金明门至建春门的东西大道已知长 2100 米，宽 13 米。南北向大道 5 条。其中，城址正南门——中阳门大道，长 730 米，宽 17 米。是北邺城南北向最宽的中轴线主干大道。

城址内，仅存地面上的遗迹有铜爵台、金虎台遗址。铜爵台基址仅存东南角，南北 50 米，东西 43 米，高 4—6 米。金虎台现存南北 120 米，东西 71 米，高 12 米。冰井台址，经钻探，不见遗迹。据记载，三台之间有阁道相通。台上有楼阁，台下有暗道，与城

西兵营相接。曹操曾率子及众文士登台赋诗。曹子建《登台赋》:“建高殿之嵯峨兮,……连飞阁乎西城……”可见三台建筑之宏大。

南邺城的平面规划更为成熟。朱明门内大道,宽近40米,这条南邺城的中轴线上座落有最大的城门——朱明门、宫城前广场、宫城正南门,宫城内最主要的宫殿也都排列在这中轴线上。

宫城在城址北半部,筑有宫墙。南邺城内道路笔直,形成网络。居民里坊分布规整。城墙拐角呈圆角状,印证了“龟形”城垣这一文献记载。

湾漳北朝大墓

湾漳北朝大墓在河北省磁县县城西南滏阳河南岸。1989年发掘。该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组成。南北总长52米。墓的规模和规格,高于同时期的茹茹公主、文昭王高润、娄叡(ruì 锐)等大墓。随葬品在同时期墓葬中也是最多的。大文吏俑高1.42米,这也表明墓主的身份地位。

该墓的墓道为斜坡底,全长37米。两壁用土坯垒砌,白灰壁面上绘壁画。道底经

夯打，白灰地面上绘画。甬道为直壁券顶砖砌结构，地面铺青石，券顶三层券，全长6.7米，分南北两段。在甬道上的门墙正中，绘一正视形象的大朱雀，展翅伫立，通高近5米。朱雀左右绘一神兽羽兔。朱雀四周饰以莲花流云。

墓道内的壁画，总面积约320平方米。东西两壁壁画对称，东壁以青龙为前导，青龙通长4.5米，并绘朱雀、神兽等。后随由53人组成的仪仗出行队列。西壁以白虎为前导，白虎通长4.5米，后随亦由53人组成的仪仗出行队伍。仪仗队均手执戟、盾、鼓乐、旄旛(fān翻)、伞盖等。表现了墓主的崇高地位。在仪仗队上方天空位置，绘有各种神兽、流云、莲花等图像。在墓室顶绘天象图，有白色银河、星宿散于天空的图案。这都反映了死后的精神世界。

随葬品2000余件。以陶俑为主。俑均施彩绘，约有1500余件。镇墓武士俑、甲骑具装俑、甲装侍卫骑俑、大文吏俑、侍卫俑、仪仗侍卫俑、鼓乐俑、文吏俑、风帽俑、笼冠立俑、舞蹈俑、侍仆俑、踞跪俑等。还有陶车、钟、磬、仓、灶、井以及陶马、骆驼、牛、

羊、猪、狗、鸡等。另有玉器和珍珠。

此墓虽未出墓志，但据墓的形制、规模、壁画内容、随葬陶俑的精美而数量众多等方面看，该墓应属东魏、北齐时期的王室陵墓。

7 隋唐两京的城郭、宫殿

长安与洛阳，这两座城，在隋唐不仅是国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国际文化中心，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着重大作用。尤其是长安城的规划，对亚洲都城建设影响巨大。日本平城、平安京即仿长安而兴建的。

隋唐京城长安城址，在今西安市区及郊区。总面积83平方公里。创建于隋开皇二年（公元582年），原名“大兴”，唐代改称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都城之一。洛阳城址，在今洛阳市区及郊区。创建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其规模及地位仅次于长安，称为东都。两京城址从50年代起勘探发掘。

长安城址

长安城，唐时曾称西京。城建于龙首原

上。北枕渭河，南面终南山。由外郭城、宫城、皇城组成。平面呈矩形。外郭城东西9721米，南北8651.7米，周长36.7公里。墙基宽9—12米。城外侧有城壕。城的方向、北偏东2度。东城建有夹城。城门12座。东、西、南、北，每面各开3门。城内布局对称规整。皇城和宫城位于外郭城北部正中处。外郭城的正南门——明德门，规模宏大。经发掘，共有5个门道。城门基址东西长55.5米，南北宽17.5米。门道宽5米，进深11.5米。正中门是专供皇帝郊祀出行的御道。

宫城，包括太极宫、东宫、掖(yè 夜)庭宫三部分。正中为宫殿区。东侧为东宫，西侧为掖庭宫。整体长方形。东西2820.3米，南北1492.1米。墙基宽14—18米，南面正门是承天门，有3个门道。城门上建门楼。唐代多在此颁布诏令，故称“前朝”。

皇城，在宫城南部，长方形，东、西、南三面筑城，北面无墙。经实测，皇城东西长度与宫城相同。南北长1843.6米。东西向街7条，南北向街5条。东西向横街宽220米。南北向安上门街宽94米。南墙西门

——含光门，经发掘，共有3个门道。中门道宽5.72米，东、西门道各宽5.35米。其建筑形制与明德门相同，为木构架城门。正南门朱雀门与宫城正南门承天门、外郭城正南门明德门，是长安城总体规划中的南北中轴线。

街道，外郭城内，据记载，南北向纵街11条，街宽100步（一步约合今1.5米）。东西向横街14条，街宽100步、60步、47步三种。实测宽度略宽于此数。朱雀大街是中轴主干大街，正对承天门，故又名“天街”。经实测，南部街宽155米，北部街宽150米。城内列置110坊和东、西两市。坊，均为长方形，面积有大小。小坊，南北500—590米，东西558—700米。大坊，南北838米，东西1115米。各坊四周夯筑围墙。

东市与西市，分别位于皇城之东南与西南。是长安城中的繁华商业区。经发掘，两市各约占两坊之地，都有“井”字形交叉街道。西市，南北1031米，东西927米，市内横街与纵街各2条，宽16米。东市，南北1000米，东西924米。都有围墙。

长安城是按方格网式规划的一座都城。整个城的平面如同棋盘式格局。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千百家如围棋局,十二街似种菜畦”。确是真实写照。

大明宫,创建于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自龙朔三年(公元663年)起,朝廷主要朝会改在此宫举行。位于太极宫东北禁苑内龙首原上。《长安志》:从大明宫“南望终南山如指掌,京城坊市街陌,俯视如在槛内”。据全城制高点,大有建瓴(líng 龄)之势。平面呈梯形,南宽北窄,周长7628米。

含元殿是大明宫的正殿。殿址台基现存东西长75.9米,南北41.3米,高15米多。殿面阔11间,进深4间。殿的东南与西南分别建有翔鸾和栖凤阁。殿阁之间回廊相接。殿前向南有3条长78米的“龙尾道”。中间道宽25.5米,两侧各宽4.5米。其形势威严壮观。

麟德殿位于大明宫西部,在南北长130米,东西80余米的台基上,建立前、中、后毗连的三殿。并建东西对称的东亭、西亭和郁仪楼、结邻楼。周围绕以回廊。建筑面积达12300多平方米。极其豪华壮丽。

兴庆宫是唐玄宗的离宫，后为听政之所。宫址长方形，南北 1250 米，东西 1075 米。宫内西南隅的勤政务本楼，经发掘，楼址东西广 5 间(26.5 米)，进深 5 间(19 米)，面积 500 平方米。宫内南部是龙池，它与花萼(è 愕)相辉楼同是宏大的楼阁，衬以水光倒影，显得格外壮观。

华清宫位于长安城东郊、骊山北麓。今西安市东临潼县境。是我国历史上显赫一时的盛唐皇家园林。华清宫遗址，今已发现。清理出五个浴池：星辰汤、太子汤、贵妃汤、莲花汤、尚食汤。其中，贵妃汤亦名芙蓉汤、海棠汤。平面近椭圆形，全用青石砌成。整个浴池平面像一朵盛开的海棠花。这一东方园林奇观的揭开，是我国隋唐考古的一项重要成果。

长安城中还有不少著名佛寺。大慈恩寺、大荐福寺、大兴善寺、青龙寺、西明寺等。通过青龙寺、西明寺遗址的发掘，证明唐代寺院是以殿址、廊庑、僧房、塔址、门址、庭院等建筑群构成的。青龙寺是唐代佛教密宗主要佛寺。当时中外僧俗来此礼佛求法，特别是日本来唐的学问僧，著名的空

海、圆仁、圆行、惠运、圆珍、宗睿到长安后，都在青龙寺展法并灌顶。因此，青龙寺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一座寺院。西明寺遗址中发现“西明寺”“石茶碾”六字残石碾，证实了西明寺的位置。据记载，日本平城大安寺是按唐西明寺图样建造的。因此，西明寺的发掘，对中日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洛阳城址

隋唐洛阳城，跨洛河南北两岸而建。宫殿区在河之北岸。北倚邙山，南对伊阙。面积小于长安城，它的布局也与长安城明显不同。

城址包括宫城、皇城、外郭城以及圆壁城、曜仪城、东城和含嘉仓城。

外郭城南宽北窄，平面略近方形。东城墙 7312 米，南墙 7290 米，北墙 6138 米，西墙纡曲，长 6776 米。墙基宽约 15—20 米。全城共设 8 门。东面和南面各开 3 门，北面 2 门，西面无门。经勘察，南墙 3 门：长夏门、定鼎门、厚载门及东墙建春门都是一门三道。定鼎门址宽 28 米。中门道宽 8 米，左、右门道各宽 7 米。在洛河以南探出南北

纵街 12 条，东西横街 6 条。洛河以北探出南北纵街 4 条，东西横街 3 条。其中，南北主干大道——定鼎门大街，又称天门街，宽 121 米。现长约 3 公里。城内里坊 109 坊 3 市。洛河南有 81 坊 2 市（西市、南市）。洛河北有 28 坊 1 市（北市）。每坊面积长宽 500—580 米之间。比长安城的坊要小。

宫城与皇城南北毗连。在郭城西北隅。西与禁苑为邻，东接"东城"，北置"曜仪"、"圆壁"两城。南临洛河。宫城平面长方形，夯筑宫墙，内外包砖。北墙长 1400 米、西墙 1270 米、南墙 1710 米，东墙 1275 米。墙宽 15—20 米。已探出北墙玄武门、东墙明德门、西墙长乐门、南正门应天门。今在应天门内中轴线西侧残房基中，出土唐哀帝玉册，为首次发现的唐代皇帝即位册文。《全唐文》（卷九八）亦载此文，题为《命皇太子即位册文》。对了解唐代皇帝即位玉册的形制、礼制制度，提供了实物证据。又在中轴线上，发掘了唐武则天明堂遗址，从部份资料判断，明堂殿基平面呈八角形，面积超过 54.7×45.7 平方米。殿堂中心有一圆形大柱坑，坑径 9.8 米。坑底为四块大青石构成

的巨型柱础。应是武则天明堂特有的高大中心柱遗迹。应天门东阙遗址，经发掘，规模宏大。气势壮观。门与朵楼、阙楼之间有廊庑相连。廊长 38 米，宽约 11 米，残高约 4 米。为夯土基础。两侧分布有整齐柱洞。阙楼基址东西残宽 32.5 米，南北仅存 5 米。从阙楼里侧残存基石及散水格局判断，当为三出阙。可能与西安唐懿德太子墓所绘"出行图"中的门阙相似。是隋唐两京考古发现的第一座宫阙遗址。

皇城，围绕着宫城的东、西、南三面。其东西两壁与宫城东西两壁之间形成夹城。皇城东南部已被洛河冲毁。经探测，皇城南北 1670 米。南墙西门右掖门为一门三道。每门道宽 6 米。其上建门楼。

还有一座含嘉仓城，位于皇城外的东北方，约建于隋代大业年间(公元 7 世纪初)，是隋唐大型粮仓之一。经勘探，粮仓四周夯筑城墙，东西 615 米，南北 725 米，墙宽 17 米。城门 4 座，四面各开 1 门。在仓城内有分布密集、排列整齐的大小地下储粮仓窖 259 个。各窖都是口大底小的圆罐形，窖口直径最大的 18 米，深 12 米左右。

最小口径8米，深6米。已发掘12座粮窖，其中9座窖中出铭砖，记粮食入仓时间为武则天天授、长寿、圣历年间。粮食来自江南和华北等地。大多是漕运入洛。在第160号窖内还保存重约25万公斤炭化谷物，这一发现是空前的。这座大型仓城的发现，为研究隋唐的仓储制度及粮食保管等问题，提供了实物资料。

8 唐代帝陵的陪葬墓

关中唐代十八陵中，昭陵是唐太宗李世民陵墓，位于陕西礼泉九嵕(zòng 纵)山主峰，昭陵南有皇族和文武大臣陪葬墓167座。近年发掘的有郑仁泰、尉迟敬德、张士贵等墓。乾陵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合葬墓，位于陕西乾县北梁山上。乾陵东南方有陪葬墓17座。近年发掘的有章怀太子、懿德太子、永泰公主墓等几座。现简介章怀、永泰二墓。

章怀太子墓

章怀太子李贤，是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的次子，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立为太子，曾招集学者注解《后汉书》。调露二年

(公元680年),武则天以阴谋政变罪将其流放巴州(今四川巴中县)。文明元年(公元(684年),逼令自杀,时年31岁。神龙二年(公元706年)陪葬乾陵。景云二年(公元711年)追封为章怀太子。妻房氏与之合葬。

该墓陵园长180米,宽143米。墓全长71米。由墓道、甬道、前室与后室组成。壁画是墓中最重要的文物,共50多幅。色彩绚丽,内容丰富。其中以“狩猎出行图”、“客使图”、“马毬图”、“仪仗图”、“观鸟捕蝉图”等最为精彩。而客使、马毬等题材,也是首见。所绘“出行图”,描绘了当时达官贵人出行情景。奔马作前导,主人骑高大白马,威风凛凛,神态自若。护从骑士着胡服、革带、长靴、佩刀、持箭,跨骏马奔驰原野,气势宏大。“马毬图”,描绘20余骑争打马毬场面。击毬者身着窄袖长袍,头戴幞头,足蹬黑靴,手持偃月形球仗,或反手击毬,或纵马迎击,活泼生动。“观鸟捕蝉图”,绘一女仰视飞鸟,另一女右手似欲捕捉树上鸣蝉,树北一女双手交叉于胸前,托披巾,若有所思。画中有诗,耐人寻味。

后墓室置棺椁，象征寝宫。这墓室中的壁画，以侍女画尤为精彩。侍女多细眉小口，丰肌玉面，发髻高耸，披帛绕肩，或着短袖，或长袖襦衫、长裙曳地，丝履微露。是唐代侍女画的珍品。

这50多幅壁画，题材多样，揭示了唐代王室宫廷生活的片断，是我国历史文化艺术的宝贵遗产。

永泰公主墓

永泰公主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孙女。唐中宗李显的第七个女儿，名仙蕙，字秾辉。嫁于武则天侄子武承嗣之子武延基。大足元年（公元701年）与其夫武延基及其长兄懿德太子被武则天杖杀。时年17岁。中宗神龙二年（公元706年）与其夫合葬于乾县之北原，陪葬乾陵。

该墓陵园长363米，宽220米。墓全长87.5米，宽3.9米，距地表深16.7米。由墓道、甬道、前室与后室组成。墓中出土文物，计有陶俑、三彩俑、木俑、金、铜、铁、玉、锡器及石刻等达1300多件。其中，壁画之完整，石刻线雕之精美，是这次考古发掘的重大收获。

墓道内和墓室四壁及顶部，都绘有壁画。墓内壁画保留有青龙、白虎、阙楼、戟架、云鹤、天体、仪卫、侍男、侍女等图像。其中，以宫廷侍女图最为突出。执鲜花、捧砚盒、戏鸟、赏花等图案，是宫廷生活的再现，也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环境的再现。墓中的石椁、石门、墓志上的线雕内容，颇使人寻味。特别是在石椁南壁雕一侍女，额上发际间插花簪，簪下垂有五条花坠。此即唐诗中的“金步摇”。两手持花枝作闻香状，寓意丰富。

俑是随葬品中最多的一类。共 878 件。大致可分为陶俑、三彩俑、木俑三大类。镇墓兽，狰狞可怖；镇墓俑，身穿胄甲；狩猎俑，架鹰驮犬；乐俑，吹笛品箫。女立俑，发髻不一；男立俑，姿态各异。胡俑 43 件，深目高鼻，络腮短胡。是研究唐代中西交通史与民族关系史的重要资料。

唐代两京长安与洛阳的近郊，也常发现高级官吏的墓葬，出土许多精美的唐三彩、金银器、瓷器等珍贵文物。

9 法门寺塔地宫

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是我国四大名刹之一。在四大名刹中，泗州普王寺，于清康熙十九年（公元 1680 年）沉入洪泽湖。岱州五台寺及终南山五台寺之舍利，在唐代会昌年间（公元 841—846 年）灭法时敕令毁坏。因此，法门寺塔地宫是我国目前唯一保存释迦牟尼真身舍利的地宫。寺内原有的塔，因霪雨而倒塌。1981 年为重建此塔，对塔基及其外围进行清理发掘。这次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今作一简介：

唐代塔基，为正方形，边长 26 米，面积 600 平方米。地宫年代不晚于唐懿宗咸通十五年（公元 874 年）。

中心方座，位于塔基中心方形夯土台基上。边长 10.5 米，面积 106 平方米。中心隆起，四周下斜，高 2.2 米。地宫后室基槽挖在中心方座中间。

地宫，位于塔基正中部位。由踏步、漫道、平台、隧道、前室、中室、后室及后室秘龛组成。总长 21.1 米。

出土遗物，计有舍利（舍利，梵文音译，意即身骨）四枚、金银器121件，琉璃及各类珍珠、宝石、玉器达400多件（颗）。瓷器16件、石质文物12件、漆木器19件、铁质文物16件、丝绸织品700多件。其中，出土的唐代金银器，数量之大，品种之多，制作之精美，都是空前的。是研究唐代贵族生活和社会风貌的难得珍品。遗物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佛指舍利4枚。均呈管状。"色白如玉，少青，细密如泽，髓穴方大，上下俱通，二角有文（纹）"。经鉴定，一枚灵骨，三枚影骨。

第一枚佛指，藏于地宫后室。贮于唐懿宗供奉的八重室函内的四门金塔。塔基正中立焊一银柱，佛指套置其上。第二枚佛指，安放在地宫中室内的汉白玉双檐灵帐中铁函内的鎏金双凤纹银棺之内。第三枚佛指，置于地宫后室秘龛内的水晶椁、壶门座玉棺之内。第四枚佛指，藏于地宫前室汉白玉阿育王塔内铜浮屠中的银棺之内。

另一类，供奉舍利而奉献的物品。在金银器中，鎏金鸳鸯团花双耳圈足银盆，重

6.26 公斤。鎏金捧真身菩萨，头上镶嵌珠宝，全身珍珠璎珞。鎏金卧龟银薰炉，炉足独角兽，造型特殊。鎏金镂空银笼子、鎏金银龟盒、鎏金镂空银香囊等，造作精巧，举世罕见。

在金银法器中，最罕见的是迎真身银金花双轮十二环锡杖，全长 1.96 米，重 2.39 公斤。钣（bǎn 版）金成形，杖杆圆形中空，通体錾（zàn 暂）饰花纹，杖顶两重莲座，錾十二体缘觉僧，披袈裟，有头光，手持法铃，立于莲台之上。

金银茶具有茶槽、碾、匙、盒、风炉等。

瓷器有瓶、碗、盘、碟等。其中，大部分是“秘色瓷”。釉色以青绿为主，釉层有透明感。是“夺得千峰翠色来”的精品。在地宫文物中也可算是一个突破性的发现。说明我国秘瓷烧制时间已在唐咸通十五年（公元 874 年）以前。

玻璃器 20 件。其中，贴花盘口瓶为拜占庭帝国产品，刻花盘、素面盘为伊斯兰产品。淡黄色茶杯和茶托则为唐朝产品。

丝织品，以平纹绢、纱、绫最多，其次为罗、锦及织金锦。还有刺绣品以及蹙（cù

醋)金绣夹半臂、蹙金绣袈裟,蹙金绣夹裙等。凡唐代各式绫、罗、纱、绢、锦、绣、印花、贴金、描金、捻金、织金,无所不有。尤以菱纹织金锦工艺精绝。再有“玳瑁开元通宝”钱。均为唐代考古罕见的新发现。

10 辽中京、金中都与元大都

辽、金、元的考古重要收获,首推辽中京、金中都与元大都遗址的勘察与重点发掘。

辽中京遗址

辽中京遗址在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城老哈河北岸。统和二十一年(公元 1003 年)开始兴建。辽代帝王常在这里接待宋朝使臣。1959—1960 年进行勘察和发掘。

中京城址的布局是仿宋汴京城(今开封)格局,由外城、内城与宫城三部分组成。外城平面长方形。南北 3500 米,东西 4200 米,周长 15400 米。城墙无“马面”,四角有角楼基址。东墙、南墙与西墙各有一处门址。南墙正门朱夏门至内城南正门阳德门之间有一条宽达 64 米的笔直主干大道。两侧有石板砌成用木板铺盖的排水沟。在大

道两旁各有对称的围以坊墙的坊区4个。坊区北面又各有廊舍遗址，长约250米，应为商业场所。还有官署、驿馆、寺院等遗址。

内城在外城正中偏北。平面长方形。城墙有“马面”，四角无角楼。自南墙正中的阳德门至宫城南门阊(chāng 昌)阖(hé 何)门之间有一条宽约40米的大道。大道两侧筑短墙，未探出建筑遗址。

宫城位于内城中部偏北。仅筑有东、南、西三面城墙，城角有角楼遗址。宫城正方形，每面长1000米。南墙正中探出阊阖门址，有3个门道。其东、西两侧各距180米处，为东掖门与西掖门址。

另外，在外城中央大道东北方，尚存一座八角十三层密檐式砖塔，通高81.39米。传为辽圣宗时感圣寺内的舍利塔。塔上发现寿昌年间(公元1095—1100年)题记。

金中都城址

金中都城址位于今北京城西南部。是以辽南京城为基础扩建而成。1966年进行全面勘察。城址平面为正方形，每面城墙均长4000余米，周长约近17公里。西城墙，从海淀区北蜂窝南行至马连道仓库、蝎子

门、凤凰嘴村一带。南墙，东自万泉寺、石门村直到右安门大街以东。东墙应在直贯陶然亭南北一线。北墙应在白云观附近西便门外大石桥西一带。每面三座城门。明清时代北京外城西侧的广安门，又称彰仪门，便是沿用金中都西墙北端城门的旧名。

宫城位于城中心略偏西南，即今广安门以南，平面长方形。经勘测，周长约600米，东墙在今南线阁街稍东的南北直线上。北墙近于白菜籽村北的东西线上。南墙在今鸭子桥以南的东西线上。西墙在今白云观至小红庙村的南北线上。

宫城中的宫殿，均配置在从应天门到拱宸门的中轴线上。内有九重宫殿，是按照北宋开封都城宫室制度设计修建的。据调查，鸭子桥村北直到广安门大街南，应是九重宫殿基址。白纸坊西大街城外与滨河路交叉路南，可能是应天门址。南自鸭子桥，北自白菜籽村经白云观到真武庙，这是纵贯全城的一条南北中轴线。中都的街道，结合文献，也有迹可寻。当时的坊里划分整齐，东二十坊，西四十二坊。

排水问题也是城市建设中的重要问

题。1990年在今右安门外发现金中都水关遗址。水关入水口东西两摆手呈倒“八”字排列。石板构筑，并以银锭铁固定。这一发现，得知中都西湖水（今莲花池）应从今右安门西南流出城。为了解金中都城内水系流向提供了实物依据。

金中都这座宏伟的都城，经元、明两代建新都、筑城垣，却只留下点滴遗迹，供后人勘探与查考。

元大都城址

元大都遗址在今北京市旧城的内城及其以北地区。为元代都城遗址。始建于元世祖至元四年（公元1267年），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建成宫城。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建成大城。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大城市之一。1964—1974年进行勘探与发掘。

大都城址平面长方形，南北约7600米，东西约6700米，周长约28600米。南城墙约在今东西长安街稍南，北墙即今北京北郊的“土城”。现已全面绿化，进行保存。东、西两面城墙的南段与明清北京城的东西城墙一致。城墙夯土筑成。墙基宽达24

米。土城顶部中心有半圆形瓦管，以防雨水冲刷。全城共有城门11座。东墙3门：光熙门（今和平里东）、崇仁门（今东直门）、齐化门（今朝阳门）。南3门：文明门（今东单）、丽正门（今天安门南）、顺城门（今西单）。西3门：平则门（今阜城门）、和义门（今西直门）、肃清门（今北师大西）。北2门：健德门（今德胜门小关）、安贞门（今安定门小关）。城的四角有角楼。和义门瓮城门遗址，在修筑地铁拆除西直门时发现。经发掘，城门残高22米，门洞长9.92米，宽4.62米。为砖券门洞。城外部建有“马面”，绕以护城河。

皇城位于城南正中地区，墙基宽约3米。宫城偏居皇城东部。宫城南门（崇天门），在今故宫太和殿位置，北门（厚载门）在今景山公园少年宫前。宫城西北有以万寿山（今北海琼岛）和太液池（今北海、中海）为中心的西苑。

大都街道：大都中轴线即明清北京城的中轴线（南起丽正门、经今地安门桥、直达今钟楼）。经钻探，在景山以北探出一段南北向道路遗迹。宽28米，便是元代中轴

线的一部分。在南北向大道的东西两侧，等距平列着许多东西向胡同。大街宽 25 米，胡同宽 6—7 米。现在北京城区的一些街道和胡同，仍可反映出元代街道布局的旧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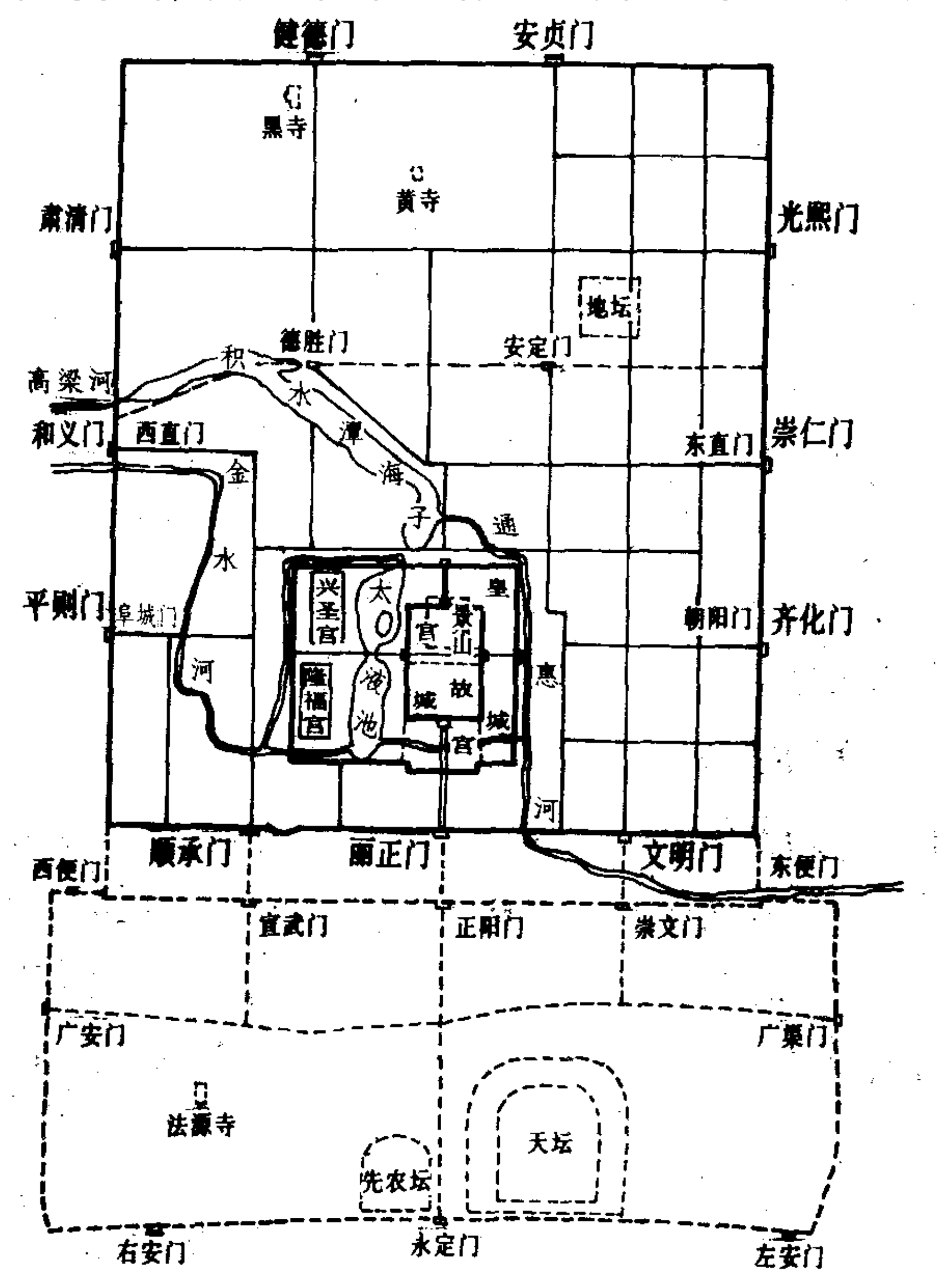


图 5　元大都和明、清北京城关系示意图

(图 5)。

11 明定陵

明十三陵位于北京昌平县天寿山。明代有十三个皇帝埋葬于此。这些陵墓环列于天寿山南麓，组成以长陵(明成祖朱棣)为中心的宏伟庞大的陵墓群，称之为"明十三陵"。

1956—1958 年对其中的定陵进行发掘，揭开了地下宫殿的秘密。定陵是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yì 亦)钧的陵墓。他的两个皇后孝端与孝靖也同葬于此。位于陵区中部偏西的大峪山下。

定陵的陵园建筑，是仿照嘉靖皇帝的永陵而建造，明楼重檐斗栱额坊全部用石材修建，宝城垛口、明楼地面也全部用花斑石，而且陵园加筑一道外墙，这在诸陵中较为特殊。

地面建筑有祾恩门、祾恩殿、明楼和宝城。

玄宫(地下宫殿)，是陵寝的地下建筑部分。由前殿、中殿、后殿与左右配殿组成。全部用石材起券结构。前殿大门的外部是

石结构券门。这是玄宫第一道大门。券门下是两扇用整块汉白玉做成的石门。前殿是一长20米、宽6米、高7.2米的长方形券室。中殿长32米，宽高同前殿，也是长方形券室。南北两壁各有石券门与左右配殿相通。中殿西端有汉白玉雕成的三个宝座，成“品”字形摆放。后殿是玄宫的主要建筑。它的设计布局与中殿成“T”字形，南北长30.1米，东西宽9.1米。四壁石条平砌，地面平铺花斑石。中部偏西是汉白玉宝床。床面铺花斑石。宝床上放置梓宫3具。中间是万历朱翊钧，北为孝端皇后，南为孝靖皇后，葬具均为一棺一椁，尸体已腐烂。

左右配殿结构形式相同，都有石门以通中殿，东西26米、南北7.1米、高7.4米。地面平铺条石。配殿中央都有汉白玉宝床，床面铺砖。这座五殿七门组成的玄宫，总面积达1195平方米。

地宫随葬品，大部放在后殿宝床上和梓宫内，可分为葬仪用具与生活用具两大类。总计2000余件。

葬仪用具：谥册、谥宝、墓志、木质和锡质明器。谥册4份，松香木制成。板长28厘

米，宽12厘米，厚1厘米，每册10板，丝绳缀连，外披织锦。内刻谥文。谥宝4个，木制，上雕龙纽，下刻帝后谥号。孝靖皇后王氏墓志1盒，志，长、宽各64厘米、厚13厘米。木质明器多为人俑和马俑。人俑多男俑，少数女俑，多着长衫。当为仪仗之属。

生活用具：冠服、金、银、玉、瓷器等。许多器物堪称稀世珍品。金冠，高24厘米，是金器中最珍贵的一件。用极细金丝编制而成。后面盘绕着二龙戏珠，形态生动。凤冠4顶，皇后在大典时戴的帽子。其中一顶六龙三凤冠，用金累丝点翠的工艺制成，通体饰上千颗珍珠和近百颗红、蓝宝石。六龙口衔珠滴与三凤相戏，寓有“龙凤呈祥”之意。是罕见珍品。金器数量很多，有盆、盂、壶、香盒、粉盒、碗、盘、匙、爵等日用品。有一镶金梨木碗，外表髹漆，内里和底托镶金。金爵、壶上镶满红蓝各色宝石，华贵美观。

玉器有碗、盆、壶、耳杯、盂、爵、带钩、玉圭等。玉爵錾为龙形，底部饰金龙，还镶嵌红、蓝宝石的盘形金座。宝石中最名贵的可算猫眼石，蟹绿色，形似猫眼，轮转照人，可称稀世之宝。玉圭8件。其中一件长

27.3厘米，宽6.5厘米，厚1厘米。上刻“四山”纹。取“安定四方”之意。这应是帝王祭祀天地宗庙时用的“镇圭”。

瓷器可分青花和“明三彩”两类。有梅瓶、碗、炉、觚等。三彩瓷炉，高17.8厘米，底款：“大明万历年制”。釉色为黄、绿、紫三色。三条蟠龙盘绕炉身，形成双耳，龙首倒立成三足，是明瓷中的珍品。

出土大批织锦。这些织锦不仅记录了织品名称、产地、产时、花纹及长宽尺寸，而且记录了织造分工及织匠姓名。是研究明代织锦的宝贵资料。

定陵的发掘，揭开了地下宫殿，出土了大批珍宝，是明代考古的重大收获。

●责任编辑／冯世平
●装帧设计／王　岐



《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

内 容 提 要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灿烂辉煌，曾长期居于世界前列，为人类文明作过重大贡献。《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从历史、地理、思想、文化、教育、科技、政治、经济、军事、文艺、体育与生活习俗等12个方面，分110个专题描述了上起远古、下迄新中国成立，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各个领域的历史与概貌，阐述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以提高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爱国主义观念，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ISBN 7－5035－0511－7
G·27　　定价：2.50元